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7年5月31日第5期 总第183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183期

目录

【专稿】

- 郑仲兵 文革答问（节选） 2

【评杨继绳书】

- 李 辅 大彻大悟的巨著——《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读后 13
- 小 鹰 对杨继绳的“文革史观”提几个问题 16
- 丁 东 《天地翻覆》争议管见 19

【读书】

- 陆 凌 七十年大限——《古拉格群岛》读后 25

【怀旧】

- 叶维丽 润物细无声——追忆我们的英语老师王旭 27

【述往】

- 蔡 楚 抢粮——成都支农往事 34
- 裴文秀 黄永辉 一个老红军的文革遭遇 38

【书信】

- 李南央 给妈妈的信（1966年6月12日） 49

【文摘】

- 单少杰 略谈中国史学的双重职能 52

【收藏】

- 胡佛档案馆设立“王复兴专档” 62

【读者来信】

1. 陆伟国正误 2. 任富田与王复兴的通信 66

【专稿】

文革答问

——兼评邓小平的文革认识和改革观

郑仲兵

一

问：什么是文革？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现在不仅在社会上，而且在史学界都是众说纷纭，思想十分混乱。不知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答：众说纷纭未必是坏事。对“思想混乱”的说法，我希望做一个界定，因为它往往被作为违背官方“统一思想”的对应物，而对民间的自由讨论加以贬斥，是一项“帽子”。我认为，只有在无视事实，伪造历史前提下的颠倒是非，强词夺理，以及不了解历史情况下的臆测妄断，才属于“思想混乱”的范畴。

文革认识思想混乱并不是众说纷纭的结果，恰恰相反，它是不让人们对话文革历史的正常反思、讨论、研究的结果，是一种受压抑、渠道堵塞的必然。据我所知，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社会掀起反思、议论、批判、解剖文革的热潮，不仅直接回答了中国为什么会发生文革？文革发生的国内、国际背景是什么？毛为什么要发动文革？什么是文革？什么是文革的历史教训？为什么要彻底否定文革？要否定什么？……而且还为文革后的中国寻找新的出路。正因如此，才有了打破封闭、打破专制、实行开放改革的共识，并在之后两三年中出现了思想解放运动、平反冤假错案高潮和重点转移、一心一意搞四化的历史潮流。但自从邓小平提出准确完整理解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直到“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便意味着中国专制主义刚开始解构即又重构。其后，对文革的深入反思和全面认识反成为异端，以专制主义立场看文革成为主流，成为官史文革的主要倾向。从这点看，“思想混乱”恰是“思想统一”的结果。

这也是邓小平搞“历史决议”的出发点，让大家按照他的意志来认识文革。本来实践和历史已然做出了结论，却被强权推翻了，代之以某个专制权威的个人意志，并要求全民在认识上和他保持高度一致，这实在是荒唐之至！但在民间、在港台、还有国外，各种不同的声音还是会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

应该看到，十年文革的折腾，不仅令社会各个阶层都到了走投无路地步，同时也把官僚体制、官僚秩序搅得稀巴烂。而后者才是邓小平的文革的痛点。文革以后，邓小平在经济建设思想上和毛泽东分道扬镳了，但在政治统治思想上并无二致，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毛泽东、邓小平所坚持的共产专制体制（虽然在形式上各有特色，如毛的浪漫主义色彩，邓赤裸裸的实用主义；毛的运动群众，邓的使用官僚），本质上是“主权在己”，而不是“主权在民”。褫夺了“四人帮”权力后，终究还是没有还政于民而是还政于己，他们和人民的关系仍是统治与服从的关系。这种统治的所做所为（如毛的反右和文革，邓的清污和八九惨案），不仅是反人权的，甚至是反人类的，也都是极端的唯意志论。

世界反法西斯（包括中国抗日）战争胜利，蒋介石政权的垮台，文革的破产和毛的去世，对于中国来说，都是改变人民命运的绝佳时机，但历史证明了，不走宪政民主的道路，不实行真正的法治（不容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力）和权力制衡，民众的命运终究不可能改变，即便是新权威主义主张的开明专制和开明独裁，也很快会走向极权。

二

问：不少人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为了反对官僚主义，你也是这样看吗？

答：我不是这么看，我也不同意这么看。虽然毛在文革中提到反对官僚主义，但这绝不是他发动文革的主要目的。他强调的是反修防修，反对走资派，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毛是看到了官僚主义对政权的腐蚀和威胁，但他坚持的是一党专政，坚持的是全面专政，坚持的是个人独裁，而这些恰是专制体制的更高阶段，也是必

然产生官僚主义的体制基础。

专制体制没有官僚体制，靠什么来专制呢？其实，毛就是天字第一号的官僚主义者。中国历朝历代皇帝多有反对官僚主义的记录，但反得了一时反不了一世，因为专制主义体制就是产生官僚主义的基础，而且他们反对官僚主义就是为了维护和强化专制统治的。

西方也有官僚主义的存在，但有宪政民主和三权分立的体制，有民选民意，有社会自治和舆论监督的机制，因此它形不成国家机器的主流力量。就像毛泽东自己所批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皇帝就是官僚的总头）一样，他不想改变甚至还要强化无产阶级专政这种专制体制，而把问题归结为个人的作风品质（所谓反对三风中的官僚主义作风），——这就是毛的反对官僚主义，结果只能适得其反。

三

问：有学者还提出“人民文革”的概念，你是怎么看？

答：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在一段时间内，竟是一呼百应，不论是官员还是百姓，不论是激进派还是保守派，他们都表示坚决响应毛的号召，认为自己是在搞文化革命。特别是毛提出的“造反有理”、“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反对官僚主义者阶级”，更契合了人民群众对各层党政领导统治的不满情绪。经过“大串联”之后，全国各地爆发了“揪出”、“炮轰”、“火烧”、“油炸”各级当权派的揪斗事件，直至造反派纷纷夺权，便一发不可收拾。加上反对“封资修”，揪斗五类分子，‘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时间天翻地覆，人仰马翻。但这不能叫作“人民文革”，这是毛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群众斗干部而出现的多数人的暴政，这也是一种异化，是对极权专制主义的惩罚。

从延安整风开始，毛就搞群众运动，建政后更发动了一系列的群众运动，文革是顶峰。群众运动就是运动群众。离开毛的“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就不会有文革；同样，离开人民群众的被运动，被愚弄也不会有文革。怎么能划分出毛的文革和人民的文革呢？

人民文革的概念，应是西方学者最早基于所谓社会冲突论提出的。须知，文革前后，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状况是很不同的。西方社会分化很充分，各个行业、各个阶层的利益诉求是很不一样的，存在着明显的社会冲突。而中国则简单得多，社会几乎被国家吃掉了，社会团体、党派都成了国家的附庸。在社会中虽然存在着严重的城乡、工农差别，甚至对立，但因为城里的职工和知识分子，生活也十分拮据，因此，主要矛盾，在经济上主要表现为社会需要和生产力低下的矛盾，在政治上则突出表现为“领导”与“被领导”、干部与群众、党内与党外之间的矛盾，总之是统治与被统治的矛盾。而社会中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并不突出，并没有严重的社会冲突。

诚然，人民群众响应毛的号召，参加文革，起而“造反”，也反映着长期积累的党群矛盾、干群矛盾及其它社会矛盾，会带着他们各自的理解、想法和利益诉求，会爆发出自己的情绪和主观能动作用。但这是群众运动即群众被运动后的必然。而且群众运动的方向和强度，基本上都被限制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意志和政策可控的范围内。

文革中人民群众不是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甚至一家人也分成不同派别吗？是的，这往往是由于人们在文革中对毛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意志有不同的领会，各执一端所致。不管他们身在哪一派，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在捍卫毛的革命路线，要把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进行到底，都赞成毛的反修防修、反对走资派的理念，都对毛至忠至诚，充斥着极端的迷信，处于极其盲目不自醒、不自觉的状态。直到文革败象突显，各阶层饱受文革祸害后，他们才逐渐起而反抗文革。既是反文革，当然这也不能叫作人民文革吧。

是不是有群众或群体把矛头指向毛泽东、中央文革，即所谓“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呢？当然有。但这不叫“人民文革”，而应该叫人民反文革。

或者，因为毛为发动群众形成“文化大革命”，采取了与反右运动截然不同的策略，如宣扬“大民主”、“四大自由”、“反对奴隶主义”、“自己解放自己”等等，与一贯的党文化教化相悖的观念，确实让一些知识青年的精神得到一时的一定程度的解放，而且更有个别人在此精神解放的基础上，继续观察、求索、反思下去，得以彻悟，后来竟成

为 1970 年代末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锋。但他们毕竟是人群中的凤毛麟角，无法授之以“人民文革”，更何况他们在觉醒过程中，首先也要以否定文革为标志。

因此，我不主张提“人民文革”，所以不主张，是因为文革就是特指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祸国殃民、持续十年，使各个阶层都走投无路，最后被举国上下推倒的这场运动。至于在文革过程中人民所表达的自己的意志和诉求，以及在过程中遭受迫害和抗争，改变不了毛文革的性质和它的大方向，因此，还是不称其为“文革”为宜。所以研究文革的历史，必须明确什么是文革的概念。

四

问：有学者称文革是乌托邦运动，或民粹主义，你赞成这个说法吗？

答：我不赞成。毫无疑问，共产主义起源于乌托邦，被英国人称颂为“圣人”的托马斯·莫尔在 500 多年前的名著《乌托邦》中就提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之后人们把虽则美好而崇高但不存在或不能实现的假想，称作“乌托邦”。我们承认，在共产主运动初期，在革命过程中，共产主义曾是人类在资本压迫下的一种美妙的理想，几代的共产主义者也多是有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愿为民众争取自由、公平、富裕的美好生活而坚持奋斗的志士仁人。然而，历史告诉我们：从 1917 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到苏联解体，在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专权下，不知给人类带来多少苦难，共产主义运动也从乌托邦开始向法西斯蜕变。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正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后阶段，预示着共产主义运动全面崩溃的开始。因此把文革称之为乌托邦显然是不妥的。如果不能认清他们这种前后的不同，还认为后来也是乌托邦理想的一部分，这岂不就是对人类历史上崇高理想的亵渎？

问：那么说它是民粹主义呢？

答：也是不妥的。民粹主义 19 世纪 60 年代后产生于俄国。当时一批自由知识分子以彻底解放农民大众为己任，发动了“到民间去”、“争取土地和自由”的运动。史称这些

人为民粹派，他们的理念和主张被称作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又称平民主义，后来成为一种十分宽泛的概念，凡旨在反对专制主义、精英主义政治对人民意志的漠视，对人民权力的剥夺，及在经济、政治、思想上对人民的奴役，都可称作民粹主义。它反映了资本主义尚不发展国家民众自醒的现象。

在历史上，他们受到列宁和列宁主义者的严厉批判和否定，直到今天仍还受到一些精英学者的贬谪。但我认为，一个多世纪历史也证明了：民粹主义认定民众的自发倾向和力量有天然的合理性（如要求耕者有其田，要求生产自主自由），主张人民主权，人民意志决定，主张文化平民化、大众化，并坚决反对专制主义的政权、制度、思想和行为，等等，都有值得肯定的内涵。

民粹主义和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一样，不等于正确。其天然弱点在于平等主义和非理性情绪。值得注意的是，有一种主张从民主主义倒退到狭隘民族主义、狭隘爱国主义、拒绝和抵制全球化的民粹主义，这种思潮在今日世界，包括欧州，都有涌动之势，其危害极大，甚至被专制主义、法西斯主义、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所利用，演变为多数人的暴政，造成“天下大乱”。这种思潮已经引起世界舆论，包括国际问题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但现在也存在另一种倾向，也值得严重关注。有的学者对具有宽泛概念的民粹主义不加分析区分，把当代一切动乱人祸的根源都笼统地归结为“民粹主义”，把列宁、斯大林的问题，甚至希特勒、莫索里尼的问题，以及当代独夫民贼如萨达姆、卡扎菲的问题，都说成是民粹主义。我以为，如此张冠李戴，制造民粹主义的恐怖，应是一种错误、有害、危险的认识；特别在中国，这种认识往往会成为专制主义扼杀民意，压制民主发展的口实。

应该看到，在毛泽东早年复杂的思想组合中，不仅包含着民粹主义的成分，同时也包含着专制主义的成分。随着中国革命事业的进展，特别到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毛泽东已演变异化为彻头彻尾的专制主义者，甚至成了不折不扣的独裁者。而文化大革命又是他的专制主义、个人独裁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怎么可以说文革是民粹主义呢？充其量也只能说，在文革过程中，毛泽东蒙蔽了群众，利用了群众的单纯和真诚，其中也利用了人民

群众中的民粹主义。

这个过程中教训是极其痛切的。天有天经，地有地义，这就是客观规律。人类逆宇宙自然的行止，必然会受到惩罚。同样，人类逆社会生态自然的行止，也必然会受到惩罚。今天人们似乎多少能看到并认识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自然（如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以及不顾环境过度开发）所遭致的灾难。但更严重的是，尚未醒悟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社会，一样会带来莫大的灾难，只不过这种灾难不是一时能看到的，要经过长久的发展才能发现。短的说，文化革命，经历了10年；长的说，共产主义，经历了80至90年。但今天很多人还是不认识到这一点，还是把希望寄托在主宰中国命运的少数人的意志上，甚至一个人的意志上。

五

问：如何理解毛泽东在文革前期赋予红卫兵和造反派以“四大自由”和“大民主”，它和我们今天追求的宪政民主有相通之处吗？

答：毛在文革初期曾赋予红卫兵和造反派以所谓“四大自由”、“大民主”，这是事实。这与传统的做法不同。虽然一部分民众一时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民主”、“自由”，甚至许多被打成右派或历次运动中受冤屈的人，也以为文革能解救他们，认为毛主席能理解自己的不幸和冤屈，奋不顾身地投入运动（苦笑）。其实，这种“自由”“民主”只是毛的一种幻术、一时的权谋而已，与宪政民主，即程序民主有本质区别：

1. 它是毛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在无任何法律根据，未经任何法律程序，在他专制主义绝对威权下，授于红卫兵和造反派——被称作“革命群众”的一种无法无天的权力。“它是毛个人独裁、无法无天的继续和放大。它不是社会民主，而是群众专政，即多数人的暴政。它是专制独裁体制下的现象，不仅和宪政民主即程序民主毫无共通之处，而就其性质和功能而言，应是完全相悖的。

2. 毛所放纵的这种“自由”、“民主”，不是所有公民能享用的，只限于“革命群众”。民众中因经济或历史原因被无端划为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资本家，还有“走资派”——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反动学术权威——各类专家、学者、科学家等高级知识分子，“三名三高”——知名作家、艺术家，还有体育精英，“工贼”——文革前许多劳模，他们不仅不享有这种“民主”，“自由”，反而恰是毛通过这种“民主”、“自由”所要专政即镇压的对象，他们中不知有多少人惨死于这种“民主”、“自由”的乱象之中。甚至如张志新这样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共产党员，党的宣传干部，只因对毛发动的文革发表并坚持了不同的看法，就遭至多年监禁，受尽凌辱残害，最后竟至被割喉枪决。除此之外，上述这些人群的子侄亲属，以及有海外关系，或被认为有其他问题的人，也享受不到“民主”“自由”，也会受到打击迫害。这和民主宪政体制下有保护人权，保护弱者和保护少数的规定有本质区别。

3. 这种“民主”、“自由”是没有任何保障的。所谓享用者的“革命群众”本是一个随时可变的不稳定的群体，今天是“响当当的造反派”，明天，或因为一句话，一件事——被认为触犯了“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会成为阶级敌人。笔者在1967年秋，私下和朋友说了一句林彪和江青有矛盾，结果就成了“现行反革命”被投入监狱，罪名是“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直到1978年即11年后才得到平反。

4. 宪政民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产物，它含盖着主权在民，保障人权（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以法治国，公权力的制衡等四项基本原则。而毛的“四大自由”和“大民主”仅仅是给予“革命群众”以“革命造反”（造“走资派”、“封资修”之反）的权力。它不是“天赋人权”，而是“毛予特权”，还要以对毛“三忠于四无限”为前提。实际上人民是既无主权更无人权。文革中即使是“革命群众”，除了底层自发的造反组织可以民选外，真正的权力机构，如各级革命委员会，各级党委名曰由“民主协商”确定的，实际上都是由少数人决定。在文革的红色恐怖中、揭批查运动中、一打三反运动中、两派武斗中、清查516运动中，不知惨死了多少人，哪有什么人权，有什么人的健康、生命、生存的权利！至于私人财产早就被剥夺殆尽了，哪有什么财产权？在文革中，连自由的字眼都不能出现，

当然更谈不上什么自由权了。文革中只有毛、江夫妇二人才真的享有自由权——为所欲为的生杀自由和威福自由权。至于以法治国和对权力制衡，那更是天方夜谭了。

5、毛泽东在利用完红卫兵、造反派后，认为他们会给自己添乱，影响自己的权威时，便借口“现在该轮到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不仅收回了“大民主”，而且把文革过程中的罪责都推到他们身上。同时，他又将工农兵划拉出来，并用“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名义对“小将”施行全面打压。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文革就剩下极端专制包括军人专制的统治了。年青人遭受“四大自由”和“大民主”欺骗苦难后，他们终于逐渐成为毛的极权统治和文化革命的对立面，直至1976年“四五”民主运动的爆发——这是真正的民主运动。在此之前，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反映出来的林毛冲突（包括“571工程纪要”），也多少反映出了这种社会情绪和矛盾对立的内容。毛在此情况下又请出了邓小平。

六

问：邓小平最反对“四大自由”和“大民主”，你是怎么看的？

答：文革中，邓小平等党政官员普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不仅‘威风扫地’，权柄尽失，而且危及到身家性命，甚至祸及子孙——当然，这也属于毛发动的文革对他们的迫害，这给了他们以刻骨铭心的刺伤和教训。邓对此归罪于群众运动的‘四大自由’和‘大民主’，因此深恶痛绝，严加防范，用他的话说，就是‘中国不能乱’。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逐步成了中国的绝对权威（他自称“第二代核心”），他提出彻底否定文革的主旨，就是否定“四大自由”和“大民主”。他回避了毛在十年文革中策略和手段的前后变化，还隐去了毛玩弄“自由”“民主”花招背后的专制主义本质。如果去掉背后的专制体制，换上宪政民主体制，“四大自由”、“大民主”有什么不好呢？文革前期之所以会出现无法无天的多数人的暴政，难道不正是在毛的独裁专制体制下发生的吗？把文革要害简化成“大民主”、“四大自由”，并把批判“大民主”、取消“四大”

作为彻底否定文革的首要任务，意在何为呢？就是绝不给民众以宪政民主自由。

邓小平 1973 年第一次复出，1975 年的治理整顿，虽然包含着人民自发力量的作用，但很大程度上他还是要恢复到文革前 17 年那一套秩序，恢复他治国理政的官僚体制。四人帮倒台后，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他自己承认，“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从宪法中取消四大自由”。在他主政阶段，他腰斩了理论务虚会，取缔了西单民主墙，抓捕了魏京生等民主青年，剿灭了在反文革专制主义中产生的民间自发组织和刊物，把反对专制主义、争取宪政自由民主的思潮和诉求称作“自由化”、“精神污染”，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对自由化高潮，先后将胡、赵两位总书记整肃下去，甚至不惜用机关枪和坦克镇压学生的民主诉求。可以看出，邓小平的文革观念和情绪，直接影响了他的改革开放观。他压制全面改革，坚持一条腿改革，用专制主义政治体制支撑经济体制改革就不足为怪了。

“大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自由，广大人民在经历了文革深重的苦难后，痛切地感受到的恰恰是专制主义的迫害。他们期望着“秦皇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期盼中国跻入世界现代文明大道，国家得以实现真正的宪政民主自由。这也正是为什么会在文革后出现改革开放，会有胡耀邦尊崇普世价值，主张全面改革，以及继耀邦之后，赵紫阳力主政治体制改革，提出建立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新秩序的历史原因。这本是反思文革教训的应有之义，即真实的民意，当然也是改革开放的应有之义。但这都被邓小平为首的专制势力扼杀了。

问：1980 年和 1985 年邓小平不是曾两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吗？

答：很多人不清楚邓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都带有欺骗性。它无非是在专制体制下实行有限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即便如此，两次嚷嚷，还都是纸上谈兵，没有落实到行动。

第一次是 1980 年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如党政分开，反对官僚主义，精简机构，提高效率，没有更实质的意义。在一党专政下，党政怎么能分开呢？而提高行政效率，即使是历朝历代的封建帝王也会做的。这次提出，热议了一阵，但过了 1980 年以后，也就无声无息了。那段时间，政治上唯一有意义的改革，当属废止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但邓小平自己，还有陈云、李先念、王震、杨尚昆、薄一波等人都以种种借口占位不退。

第二次是1985至1986年邓嚷嚷得很厉害的政治体制改革。其实仍然停留在行政体制改革的层面。

我之所以说他带有欺骗性，是因为两次提出，都有国际背景的逼迫。他提出的内容本质上都是反民主的。1980年的提出，是受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改，特别是波兰团结工会领导的民主运动的激荡，邓小平此举具有一箭双雕的目的，一是为了逼华国锋下台，一是为了遏制这拨民主浪潮对中国的冲击。邓第二次提出，正值新一轮民主狂飙席卷亚洲。菲律宾独裁者马科斯被民众赶下台，韩国总统也在学潮背景下下台。台湾民众游行要求取消一党专政，蒋经国顺应潮流，开放了党禁报禁，开启了亚洲民主改革之先河。在此大背景下，邓讲了十数次话，提出要搞政治体制改革，并指定由赵紫阳负责。但正如他对赵紫阳的指示，“三权分立的一点影子都不要有”。离开三权分立，如何建立现代国家的政治制度呢？学生却不知其诈而轻信了他。结果，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却以“反自由化还要反二十年”画了句号，从而逼出了1986年的大学潮。邓借机罢黜了总书记胡耀邦。1989年又罢黜了总书记赵紫阳，并血腥镇压了八九民运。这就是邓两次提出政治改革的情况。

此时，邓小平又把5年前提过的又搬了出来，就是要否定老百姓对民主宪政的诉求。他是虚伪的，但学生却信以为真。邓的所谓政改与学生要求的宪政民主根本不同，这才有89年的武装镇压。

现在还在赞颂邓小平的政改，是没有读懂邓小平和邓后来的诠释。反自由化要反20年，后来又说要反50年，这与毛泽东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是同意语。

所以要丢掉幻想。还有幻想就会成为专制制度的社会基础。■

2015年5月

于潘家园

【评杨继绳书】

大彻大悟的巨著

——《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读后

李 辅

杨继绳先生的《天地翻覆》问世了，读到这部好书，我十分高兴。杨先生能写出这部振聋发聩的佳作，除了他的学识、功力、辛劳之外，最根本的是他破除了迷信，识破了谎言，达到了大彻大悟的境界。我卷入过文革，曾是紧跟毛主席的造反派。我以为自己了解文革，读了《天地翻覆》后，才明白自己知道的太少，思想还未完全冲破谎言的禁锢。

杨继绳认为：“文化大革命发生、进程、结局和后果的深层动因，要在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的制度中寻找，要在当年奉行的意识形态和毛泽东坚持的道路中寻找。”他找到了一条理清文革头绪的路线图。他指出：文革是毛泽东、造反派、官僚集团之间的三角游戏，这场游戏的最终结局是：胜利者是官僚集团，失败者是毛，承受失败后果的是造反派。他的分析符合实际。

官僚集团成为胜利者，他们掌握了解说文革的话语权，用谎言歪曲历史。近二三十年，出版有关文革的书籍虽然控制很严，但体制内高官出版回忆录并不困难。他们按照自己的需要解释文革，掩盖真相。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担任山西省委书记的李立功，退下来以后写了一本《往事回顾》（中央党史出版社，2008），其中提到他在北京文革中的两件事。1966年6月，彭真被打倒以后，他被调到北京市改组团市委，任市团委书记。在此期间，参与了派工作组。毛泽东决定撤销工作组以后，受害群众向工作组要黑材料。李立功写道：所谓“黑材料”，就是工作组的笔记本，那上边记有基层党组织和积极分子汇报的内容，包括对形势、对人员的分析，一些人的姓名、出身、政治态度等都有记载。“要交出来，就必然引起群众斗群众。”他绝口不讲工作组的目的、任务，不讲工作组抓右派、抓反革命，镇压群众。

同样这件事，《天地翻覆》则指出，“工作组在各校的主要任务，名为领导文革，实际就是抓右派。”“刘、邓主持工作的党中央与各大区、各省市的中共领导人，决心按照1957年的方式，大抓右派，把反右斗争铺开成全国性的运动。如果说1957年是第一次反右的话，那么，这是第二次反右。第二次反右比第一次反右更广泛、更凶猛。”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被打击的人已经获得了自由，但名誉没有恢复，整他们的材料（当时称为“黑材料”）还在当权派手里。有的当权者想把这批材料留下来，在运动后期“秋后算帐”。

同一件事，李立功的回忆和杨继绳的分析，立场不同，结论不同，高下立判。

关于“西纠”和“联动”，李立功在《往事回顾》中说：“他们在‘造反’的过程中看到混乱情况的疯狂蔓延，看到一批革命功臣和众多的好人被打倒，对乱打乱砸乱抢是不是革命行动发生怀疑，于是在红卫兵组织中发生了分化。比如，在北京市就先后出现了‘西纠’和‘联动’这样的组织。”“呼吁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严格制止乱打人、耍流氓、破坏国家财产等行为”，“发布了保卫国家机关、保护国家机密和维护首都社会秩序等十几道通令。他们的出现受到广大群众的赞扬和支持。当时我也感到这才是真正的革命行动。”

对于“西纠”和“联动”，《天地翻覆》则用了8页篇幅，“从它成立时的自定的任务、发表‘公告’的内容、他们的实际行动、‘西纠’成立以后红色恐怖是收敛还是发展等几个方面分析”，用大量事例证明“西纠不仅没有制止红色恐怖的效果，西纠成员自己还在继续制造红色恐怖。”书中还展示了一位联动成员1967年4月写的一封信：

北大附中井冈山兵团的混帐王八蛋们：

别看你们今天他妈的闹的欢，将来小心你们的驴头。崽子别狂，等着瞧，20年后世界是我们干部子弟的，你们靠边站！你们今天斗了我们的人，这血恨一定要报。小王八蛋们别高兴得太早了。

不管你们是真积极还是假积极，反正革命的重担不会落在你们身上。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崽子们，考虑考虑你们的后路吧！

干部子弟要掌权！

天下是我们的！

北京 101 中 你们的爷爷——老红卫兵

李立功把西纠、联动“受到赞扬和支持”强加在广大群众头上，未免把老百姓看得太愚昧了。“当时我也感到这才是真正的革命行动”，或许才是他的心里话。

《天地翻覆》第二十九章专门写了全国清查“四人帮”和清理“三种人”的情况。这是此前文革史不曾正视的，却又是文革史研究不能回避的重要环节。书中写了胡耀邦对这两项工作的许多讲话、指示，强调不要扩大化，不要制造新的冤假错案，他实事求是的态度令我感动。可惜的是，胡耀邦在这些问题上并没有决定权，拥有决定权的是那些党内元老。《天地翻覆》的作者告诉人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官员复职以后，没有记住产生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却牢记了对造反派仇恨。他们不怕当‘还乡团’，除了对造反派进行无休止的报复以外，搞起特权和腐败来超过文化大革命以前。”

清理“三种人”就是官僚集团报复造反派的重要举措。曾经担任山西省委副书记的卢功勋，也出版了一本回忆录《回顾与思考》（中央文献，2014），讲述了他在山西省领导清理“三种人”的经过，讲他如何从最初全省动用三千人到最后动用一万人，历经四年，取得的辉煌战果，并特别讲到把我打成“三种人”后，他给薄一波汇报，薄表扬“这是山西的一个胜利”。本来是山西省委作出的决定，省委却不出面行文，而要基层支部履行手续。开除我的党籍，只有支部决定和总支批示的“同意”，没有按照党章规定要经县一级党委批准，闹了个程序不合法。这些细节卢功勋当然不讲。

关于我的遭遇，耄耋之年的前山西省政府副秘书长郝思恭写了一篇长文《阴霾散去是蓝天》，已经讲清了真相。《天地翻覆》引述了我的自传《所思所忆七十年》中的相关素材。能被仗义执言的杨先生写上一笔，我这个地方人物，也算进入了中国大历史的视野。

了解真实的历史，启迪国人的公民觉悟，《天地翻覆》可谓到目前为止最好的文革史教科书。我衷心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读到这本书。■

【评杨继绳书】

对杨继绳的“文革史观”提几个问题

小 鹰

文革的史料丰富，浩如烟海，任何“文革史”因篇幅有限，都只能挂一漏万，但基本的资料和文献都是公开的。因此，写作“文革史”的主要问题，在于用什么样的观点来统帅历史材料？而正确的史观应该是建立在全面客观地梳理史料的基础之上。

如果有意略去或歪曲那些最重要和最基本的资料与文献，如果带着主观的偏见或“派性”，“先入为主”，选取“史料”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意见，那么，这种“文革史”还是在“打派仗”，观点上就站不住脚，而结论也一点意义都没有。

我没有通读杨先生的《天翻地复》，但从前言以及《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一文中，可以看出他治文革史的观点。以下对此先简单谈些看法。

杨继绳说：“文革以后，主流舆论把文革中的一切罪恶都加在造反派头上，这完全违背历史事实。就文革中大量死人这个突出问题上，绝大多数受害者，不是死在造反派得势的时候，而是死在镇压造反派的过程中和军政官僚控制的‘新秩序’下，死于专政机器对普通群众有组织的大规模虐杀。‘造反派’得势时确实也很野蛮，但镇压他们的人更野蛮，在文革十年中，造反派得势只有两年，而造反派被整却长达八年，文革以后还遭到更加残酷的整肃。造反派的受难人数和程度百倍于‘当权派’和‘保皇派’。造反派是文革最大的受害群体，他们是文革的牺牲品。”（《天翻地复》）

对杨继绳的这个文革史观，我有几个问题。

一、文革开始的头两年，造反派反的是什么？是不是如钱理群所说：“基本上属于‘奉旨造反’”？造反派是不是要“誓死捍卫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道路’”？跟着毛泽东去打

倒“走资派”刘少奇及其“司令部”？造反派“得势”的这两年，是不是如鲁迅所说的，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二、文革的后八年，造反派之间又在争什么？争生存？争宠？或是争做“新官僚”？毛认为他们是在搞“无政府主义”，破坏了“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不听话（“造反派真的反了？”），所以要镇压。这后八年以及后来，多数“造反派”不但没有受到提拔、重用，没有让“出国镀金”，许多属于“泛红二代”的“造反派”也没能如“正红二代”那样“升官发财”，反遭到整肃，这又是不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钱理群以“奉旨造反”一语，正确地道出了“文革群众政治的依附性”。正是由于这种“依附性”，文革显然不是“一场三角游戏”（杨继绳），更不是“一场现代版的三国杀”（孙怒涛）。

三、文革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是反“官僚”，还是反“走资派”？

杨继绳认为，文革是一场“独裁”对“官僚”的斗争。文革发生的原因是他所谓的“第一重紧张关系”（官民矛盾）与“第二重紧张关系”（官官矛盾）的“互相交织、互相纠结”。而“毛最终找到的办法是，他自己直接成为底层群众的代表，甩开官僚集团，直接发动群众、指挥群众‘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火烧’官僚，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杨继绳，《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

但是，这种说法有什么历史文献和重大史料作为根据吗？这是毛泽东本人的意思，还是杨继绳自己的揣测？究竟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这么大规模的“文革”呢？

我以为，我们研究文革还是要看最基本的历史文献，如毛泽东主持批发的“社教23条”、“五·一六通知”以及“文革16条”等。那里面讲得很清楚，这场运动就是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除此之外，他并没有什么其它的“隐秘动机”；而毛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里，更直接写明了他对刘少奇的问罪。当年毛泽东亲自修改过的戚本禹“讨刘檄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句句道出了毛倒刘的意图，毛和戚数算刘的“八大罪状”里，讲的明明都是“两条路线斗争”和“两

个司令部的斗争”，哪里有什么“官僚”二字？哪里有什么“官民矛盾”和“官官矛盾”的说法？文革中它“脍炙人口”，“妇孺皆知”，怎么现在这些刘少奇一贯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事情都没有了？

在逻辑学上，把文革的“宗旨”从“反走资派”变为“反官僚”或“反官僚政治”，这属于“偷换概念”，转移话题。结果是，把文革研究引上了歧途。这种“民粹主义”性质的“偷换”很容易迷惑人，危害也极大。

我的看法是，文革是建国后17年来，国家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积怨的总爆发，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要彻底解决“两条道路和两个司令部”的问题。我接受毛本人的说法，但问题在于，到底是毛泽东的那条“社会主义”路线对，还是刘少奇的“走资派”路线对？搞清楚哪一条“路线”违反了社会发展规律，代表黑暗与反动？哪一条“路线”合乎中国的实际状况，代表光明和进步？或者，如果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是要“反修防修”，那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上来看，究竟谁才是“修正主义”？是“刘修”，还是“毛修”？

我认为这些才是现在“研究文革”要认真回答的关键问题。

如果只是凭着自己的感受走，以为文革是一场“独裁”对“官僚”的斗争，这种治史观点不仅肤浅，更是错误的，它模糊了文革的实质，因而得出的结论是有害的。

本人更详细的论述，点击参见：

小鹰：《刘少奇是“官僚”，还是“走资派”？》（2017年2月）

http://www.azcolabs.com/xy_wg_fgl.html ■

【评杨继绳书】

《天地翻覆》争议管见

丁东

杨继绳撰写的文革史《天地翻覆》去年11月由香港天地图书公司付梓面世，在学界引起了一些争议，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

关于造反派情结

最近，学者郭建在台湾《思想》季刊发表《文革研究中的造反派情结》一文，提出了一个新问题：直接参与、投身文革的经历是他们研究文革得天独厚的条件，读他们的著作常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真切、地道、在行，以至于阅读有关文革的著作，读者经常可以从字里行间猜出作者的年龄。但是，个人感情的沉迷有时会影响对他人境遇和全局经验的理性思考和判断，深深的卷入也往往会因为“身在此山中”而产生观察上的局限，所谓“造反派情结”就是我在不少有关文革的著作中隐约感到的一种局限。

郭建的评论对象不限于杨著，但包括杨著。

到目前为止，多数中文撰写的文革史叙述属于邓小平语境，以邓小平的看法为是非标准，遵循的基本结论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按照这个逻辑取舍史料，文革的最高决策者毛泽东是好心犯错误。文革初期刘邓按照反右模式派工作组枪打出头鸟受到肯定。官方认定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不是描述成文革的受害者，就是文革的抵制者，他们在文革中某些阶段积极追随毛泽东的行为即使不回避，也要解释成身不由己。文革的罪责尽量归结到林彪、四人帮、康生和造反派头上。

还有一类文革叙述则坚持毛泽东语境。其特点是以毛泽东的观点为是非标准：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近几年，这种声音重新抬头，最具代表性的是2016年出版的《戚本禹回忆录》。官方提出“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之后，官史也有了重新向这种语境靠拢的迹象。

杨继绳的文革史观与上述两种语境均有根本区别。他认为文革是一场毛泽东、造反派、

官僚集团之间的三角游戏，这场游戏的最终结局是：胜利者是官僚集团，失败者是毛泽东，承受失败后果的是造反派。他对毛泽东、造反派、官僚集团三方都持分析批判的态度。在他看来：皇帝通过治官来治民，治官是皇帝的主要职责，也是皇帝最大的难题。中国古语说：“天下难治，人皆以为民难治也，不知难治者非民也，官也。”毛泽东也面临这个难题。毛是这个官僚集团的一员，他又不同于他治下的官僚群体。他是董事长，不是总经理。他需要官僚集团实现他的意志，但官僚们既有恪守职责的一面，也有为自己、家庭和“山头”谋求利益的一面。官僚集团有独立于最高统治者之外的利益。前者为“公”，后者为“私”。他认为：在极权主义官僚体系的统治下，不仅在官民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第一重紧张关系），在官僚体系内部也存在着紧张关系（第二重紧张关系）。第二重紧张关系是因为干部任命制、上级决定下级的命运造成的，也与“打天下”过程中形成的派系、“山头”有关。处在极权主义官僚体系顶端的毛泽东，处在两重紧张关系的焦点上。他常用第一重紧张关系来制衡第二重紧张关系，用民粹主义的口号来缓和第一重紧张关系。用民众的力量来平衡极权主义的官僚体系，就是鼓励群众造官僚的反。在文革中，这两重紧张关系互相交织、互相纠结，使政治斗争失去了是与非、正确与错误的界线，广大参与者成了角斗场上左冲右突的群氓。沿着这条思路，他冷峻地还原了高层真实的政治生态，让人们看到各类高官在党文化潜规则里怎样趋利避害，使伟光正的光环烟消云散。从这种三角关系出发，头绪纷繁的文革过程，得到了清晰的梳理。《天地翻覆》没有结束于1976年，而是延伸到1980年代。书中对清查516、揭批查四人帮运动和清理三种人，都有专门的章节，用丰富的史料，展示了造反派承担文革后果的图景和细节。

这种既超越毛又超越邓的文革史观，并非杨继绳一人独创，而是相当一批秉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者共同探索，互相启发的产物。但运用这种独立史观写成完整的中国文革通史，杨继绳可称国内学者第一人。

无庸讳言，杨继绳在文革中有过参与造反派的经历。当时他在清华大学读书，参加的是相对温和的“四一四”派。他崇拜过毛泽东，又反思了毛泽东。他在七十年代中后期对

邓小平怀有希望，支持邓的经济改革，但在八十年代后期，又对邓的政治举措十分痛心和失望。他晚年修国史的视野，已不是站在中国看世界，而是站在世界看中国。他无意为自己和同代人文革初期陷入盲从参与造反的失误翻案。他说，造反派在文革中也不是完全无辜。他们是毛泽东制造“天下大乱”的主力，对中国文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破坏有重大责任。他们在冲击官僚体系的时候，也使一大批好干部受到残酷迫害。造反派群众组织相互争斗，甚至制造大规模武斗，殃及无辜。他们是实现毛泽东乌托邦的推手，是坚持毛的极左路线的先锋。如果他们的主张（即毛的主张）得逞，中国要倒退很多年，会更加远离现代化。但是，1966年5月到8月，将大批学生、老师、工人、普通干部打成“右派”、“黑鬼”、“小三家村”的不是造反派。1966年8月到9月，抄家、打死人，将成千上万的市民赶出城市，将大批文化名人迫害致死的不是造反派。制造北京大兴县、湖南道县对“五类分子”及其子孙后代的大屠杀和清查“内人党”等骇人听闻的重大惨案与造反派无关。在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5·16分子”运动中的对大批无权者残酷迫害的不是造反派。他针对主流舆论对文革图景的简化和歪曲，力图廓清造反派的历史真相，同时还原官僚集团的真实表现，并把他们对造反派的报复入史。郭建在文章中引用外国人的说法，把官僚集团的代表人物说成是务实派，温和派。在采取什么经济政策治国的问题上，他们的确比毛泽东务实。从这个意义上，外国人称之为“务实派”不无道理。但经济上的务实不等于政治上的温和。在政治问题上，不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哪一位心慈手软？邓小平自己就明确地说，两手都要硬。胡耀邦、赵紫阳倒是在经济上主张务实，在政治上对参加过文革造反的青年一代相对温和，但他们先后都出局了。

文革的跨度长达十年，毛泽东发动运动不是一次，而是发动了多次，有政治热情、愿意投身公共事务的中国公民，这一波不卷入，下一波就会卷入，很难始终保持逍遥派的角色。经过清理三种人和记录在案，这一代人中的不少精英被打入另册，剥夺了从政的机会，只有少数老红卫兵得到陈云的保护。虽然杨继绳本人并没有因此打入另册，但他不能无视同龄人所受的不公正待遇。国门打开以后，我们已经知道文明国家公民参与政治有怎样的

开放度。如今，经历过文革的一代人已经垂垂老矣，反思青年时代的盲从固然重要，讨还历史的公道也十分必要。“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为了追求历史的公正，不畏权势是一种史德的体现。

史料问题

有人认为，《天地翻覆》没有提供多少新的史料。和《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披露了作者对软禁的中的赵紫阳的采访、《墓碑》中披露了不少大饥荒的档案材料相比，这部文革史不以披露新材料见长，而是尽可能地广采博收近几年已经公之于世的文革史料。这部书完成，作者独自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三部曲就贯通了。

杨继绳并非没有挖掘新史料的能力。他在《炎黄春秋》工作十几年，许多掌握文革独家史料的作者苦于文章无处发表，不约而同地把《炎黄春秋》作为发言平台。如果出于私心，他若想独占某些稀见史料，不无机会。

我和杨继绳在《炎黄春秋》共事半年。当时他担任总编辑，我在此期间只主编过一期杂志（2016年第5期），但也披载了文革的独家史料。王辉整理的解学恭《八届十一中全会日记》，就是杨继绳向我提供的。我还提出在访谈录栏目中发表杨继绳和萧冬连对吴南生的采访。因为《炎黄春秋》规定文章一般要控制在万字以内，我主要选取了吴南生讲述创办特区的内容，但杨继绳在终审时主动提出加上一段吴南生向他讲述的历史细节：“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南局、西南局、华东局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讨论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初稿，他让人打电话叫刘少奇到广州。北京回答：少奇同志正在主持西北、东北、华北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工作会议，能不能晚两天来？毛听了大发脾气，写了一个条子给陶铸，让陶铸到北京把刘少奇叫来。我当时是省委办公厅主任。赶紧为陶铸准备专机，但是，这边专机刚准备好，北京的专机来了，刘少奇不请自来了。刘少奇被打倒后，我调出毛给陶铸的那个条子，只见上面写着：‘是哪个皇帝骑在我头上拉屎，

现任命陶铸为特命全权大使到北京接驾。’可能是陶铸看到条子给邓小平打了电话，说主席生气了，让少奇同志赶快来吧。刘少奇就立即来到了广州。这张条子当时在中南局档案馆，后移存中央档案馆。”这一细节对于研究文革前的毛刘关系无疑价值颇高。当时杨继绳的书正要杀青，如果他把这一史料留在《天地翻覆》面世时独家披露，也顺理成章。但他还是本着学术为天下之公器的理念，为着尽可能加大《炎黄春秋》的信息量，决定先行在杂志上公之于世。

只是未定稿

这本书的出版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殊现象。目前投放市场的书，是作者2015年底的稿子，后来作者多有修改。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版只是未定稿。天地图书公司曾经出版《墓碑》，此书继续由他们出版也在情理之中。杨继绳早就把《天地翻覆》的初稿发给天地图书征求意见。然而，刚走到这一步，杨继绳就遇到了强力阻挠。当时我和杨继绳在杂志社经常见面，对此略知一二。官方某部门看到杨继绳2013年10月在一个学术会议上披露此书的导论《道路·理论·制度》，便如临大敌，由作者退休单位约谈多次，阻止此书的出版。杨继绳当时表示，目前此书还在修改，和出版社还没有签约，可以考虑推迟出版。

此书在香港投放市场，作者并不知情。当时杨继绳还在核实细节，查对一些史料的注释。至于图书出版一般流程——出版方出清样，由作者进行核校，都谈不上。出版方采用非常方式，让生米煮成熟饭，可谓用心良苦。问世以后，读者发现误植不少，一位细心读者就能挑出上百处。香港出书通常第一版印数不多，如有机会再版，作者可以修改。如《墓碑》再版15次，前8版每版都有修改。特殊的出版环境里，《天地翻覆》这些误植只能算白璧微瑕，并不影响本书整体的魅力，遗憾可留待今后弥补。如果拘泥于规范的出版流程，此书可能胎死腹中，那样对文革研究的推进才是更大的损失。我相信杨继绳先生会听取读者的意见，以后有再版机会时，会认真弥补初版的不足。■

【读书】

七十年大限

——《古拉格群岛》读后

陆 凌

《古拉格群岛》是一本巨著，对于非专业的普通读者而言，通读实在是挑战。我是从英文节选本开始的，拿起来就放不下了，三卷本的中文译著，160余万字，前前后后读了一年多，阅读的过程漫长而痛苦，但我读得非常认真，眉批旁注写了很多，我认为这本书对于中国人来讲，现实的意义甚至大于俄国人。说个插曲，在纽约一个公共场所读英文节选本时，一位中年妇人走过来，对我说：“这是真的，的确发生过！”她说的英文和我一样，是有口音的，我猜她来自俄国。回到家后，想着她问我的问题，为什么要读此书，我有答案，不知何故，当时却没直接回答她，因为类似的事情后来在中国也发生过，这也是真的！

读《古拉格群岛》，看到的是苏联的故事，想起的却都是中国的事情，两个东方的古国，在二十世纪，一前一后，走了何其相似的一条道。我们信仰着同样的“先进理论”，同样曾经豪情满怀势如破竹，也同样经历理想幻灭、失意彷徨，我们都有伟大领袖，同样曾经顶礼膜拜五体投地，也同样把他们拉下神坛视如敝履。他们有布哈林、米高扬、赫鲁晓夫、高尔基，我们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郭沫若。他们有大清洗，我们有文革；他们要赶美，我们就超英；他们有乌克兰大饥荒，我们有“三年自然灾害”；他们有古拉格，我们有劳改营；他们有二十大，我们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他们有“六二”新切尔卡斯克事件，几乎整整二十七年后，我们有“六四”北京天安门广场事件。人类历史上，两个幅员如此广阔、如此不同的国家，政治发展进程却如此相似，实属罕见，究其原因，除了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以外，共同的信仰，是造成这种现象最根本之原因。

1917年，布尔什维克取得革命胜利，逐步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1991年

苏联解体，象征无产阶级革命的红旗从克里姆林宫的穹顶上降下，前后历时 74 年。1949 年，中共取得革命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今已 67 年，向往民主、渴望自由的人们期盼着“七十年大限”也会在中国发生。对于此，许多人，包括许多为民主和自由而战的中国人，都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他们说，中共与苏共有很多的不同，他们说苏共出了莽夫赫鲁晓夫、叛徒戈尔巴乔夫，中共党内绝不会出现这样的人物；他们说苏共僵化守旧经济停滞不前人民穷困不堪，中共与时俱进经济改革开放人民小康富足；他们说俄罗斯人有血性绝不会无限期地忍受奴役，中国人充满奴性绝不敢与专制抗争。读完《古拉格群岛》以后，我发现，苏共与中共就像同一条铁轨上，一前一后开往不归路的两列火车，目标一致，线路相同，场景类似。也许一个烧煤一个用电，也许一个坚决一个犹疑，也许行驶有快有慢，也许司机各有特点；但是，既然没有改弦易辙的可能，一个已然覆亡，另一个必将覆亡，这是历史的必然性。稍有悬念的是，后者覆亡的方式会与前者有怎样的不同。

需要指出的是，像自然界所有生物一样，政治理论和党派有孕育、出生、成长，也有衰老和死亡，这是客观规律，不是什么可怕的事。而且，红旗倒下，人头不一定要落地。苏联覆亡了，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之流以及其他的共产党人并没有被肉体消灭。与其抱残守缺，逆历史潮流而动，苦苦挣扎，杯弓蛇影，不如摒弃陈腐，顺历史潮流而为，大展宏图，建立真正的共和。

读完这本书后，我情不自禁把黑暗的中世纪和二十世纪共产主义运动进行比较，把基督教在中世纪的地位及所作所为，与马列主义在二十世纪的地位及行为联系起来进行类比：两者都自以为是至高无上绝对正确的真理，他们都主张并严厉惩罚异教徒或异己者，宗教审判是维护基督教义的强力手段，古拉格群岛则是马列理论的实践和专制集权的体现；两者都有崇高的目标、向往天堂，却都在一段时间里把人间变成了地狱。基督教后来的进化、去神化或人性化，是源于政教的彻底分离，世俗的政务由备受约束的政府经办，精神的净化，灵魂的控制，则由教会来做。马列主义若欲存续，也需要通过一上一下两个手段来进化发展：上升为真正的宗教，摒弃暴力，让人们虔诚地信仰；下降到民众中，政教分

离，不再有能力去强行灌输自己的主义和思想，而让信徒们和平地传播自己的教义，这才是马列教净化、升华及发展的终极手段。如果未来世界中，教派之争，不仅限于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犹太教、摩门教和伊斯兰教等诸多宗教之间的竞争，还有它们与马列教之间的竞争，也许，这才是现代社会人类思想最重大的进步。

七十年大限，从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轨迹来看，有其历史必然性，就人类重要思想的发展与演变而言，也许未必。

最后，向译者致以敬意。田大畏先生等人翻译、群众出版社发行的《古拉格群岛》，文字精美，质量上乘，是对原著的弘扬。值得一提的是，田大畏是田汉先生的长子，父亲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儿子也是心向自由勇敢笔耕、揭露专制奴役本性的好汉。只是，父亲颂扬的和儿子批判的却是同一个制度，这是历史的反讽，也是现世的报应。■

【怀旧】

润物细无声

——追忆我们的英语老师王旭

叶维丽

我最近又了解到一些王老师的情况：她是燕京或辅仁的毕业生，基督徒，在那个宗教即鸦片的年代，她做人十分隐忍压抑。业务很好。50年代初英文不受重视后，曾改教数学多年。一位老师至今仍然记得她写的教案，一步步十分清晰。我们班同学也还记得她一次上课用英文给我们讲数学。写一写王旭老师的想法在我心中转了很久，拖到今天才动笔，是因为我对王老师知道的不多，无法像其他一些校友，写起她们熟悉的老师来洋洋洒洒。但我却总是欲罢不能，心中有个声音一直在催促：要写，得写。下面所记与王老师有关的种种，一部分来自同班同学看到这篇小文初稿后的回忆与提醒（在此致谢），一部分是我个人的点滴记忆和离校后的经历与感受。在我人生的几个重要阶段，王老师的形象总会浮

现在眼前。今天细细回想，母校教过我的众多师长中，我在心底视作“恩师”的，只有王旭老师一人。在百年校庆之际，作为一名老学生，我向王老师的在天之灵表达迟到的感谢和敬意。



（王旭老师的这张照片摄于1958年，是从一张合影中剪下来的。原片很小，放大了就更不清楚。1963年王旭老师教我们班时，头发已经梳成竖直，没穿过有花色图案的衣服。1965年她再次教我们时，更是朴素至极。那是我们记忆中的王老师。）

我1963年入女附中初中，1965年秋上初三，王老师是我们初一和初三的英语老师。那几年中国正在一步步走向文革，小小的女附中也紧随潮流而动，这个时代背景很重要。

王老师初接我们班时，听消息灵通的同学说，这位老师不仅能教英文，也能教高中三角，还说，她是“美国教会学校”毕业的。何谓“教会学校”，十几岁的我们并不真懂，只知道那是“旧社会”的学校，跟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沾边儿，说来并不光彩。

“旧社会”过来的老教师对我来讲并不陌生。我的小学“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正副校长是两位“老太太”：陶校长和汪校长，一位和蔼慈祥，一位干练利落，她们应该属于民国时期出现的一个新生事物——受到现代教育的职业女性，其中很多人从事中小学教育事业。我一年级的班主任严老师也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是她在开学第一天对我们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这些老教师不但受到学生们的爱戴，也受到年轻教员的尊重。虽然这时“新社会”和“旧社会”的说法在社会上已经十分流行，但我们没有将“旧”的标签和自己的老师挂勾，而是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许多“旧”的道理。也许这是因为我们年幼懵懂，也许是因为那时“政治”还没有全面深入地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我一直觉得，在我们小时候的教育中，“刘胡兰”和“白雪公主”是能够和平共处的——“刘胡兰”代表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白雪公主”则指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和从西方引进的“人文主义”精神在内的、来自“旧社会”的东西——有一天，它们统统会被批判为“封资修”而遭到唾弃，进而被“砸烂”。

之所以在回忆中学生生活的文字中提到小学，是因为我对中小学的记忆迥然有别，总忍不住回味对比。小学的生活是温馨的、单纯的。中学呢？恕我直言，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那个“阶级斗争”之弦越拧越紧的“革命化运动”，“白雪公主”遭到摒弃，只剩下变得“高大全”的“刘胡兰”。

1963年秋刚上初中时，那个“运动”还没开始。我们班是英语班。当年的英语，没像后来那样在众多语种中一枝独秀、人人趋之若鹜，它只是一门外语而已。从初一到初三，我一直对它没怎么太上心。

我没有王老师第一次走进我们教室的印象了。她长相普通，个子很高，背有些驼，直溜溜的头发盖过耳际。大约四十几岁，衣着式样简单颜色灰暗。就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平平常常的中年妇女，朴素到无性别感。

我是个不起眼的学生，成绩一般，坐在教室后排。初次接触一门外语，没觉得它怎么有趣，也没觉得它生硬难啃。不记得我在课外花多少时间背单词和诵读课文，也不记得王老师是怎么教我们开口说英语的，又是怎么纠正我们发音的，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教学方法——这些课堂上的细节都被我忘得一干二净。记忆里，一切都井然有序、按部就班，好像一条顺风的小船。王老师从来不对我们着急上火、疾声厉色，我们这些女孩子也没因为碰上逗乐儿的事儿而开心大笑过，就像我们头发梳的直溜溜的老师。我们的英语课堂既不“生动”，也不“活泼”，在舒缓平和的氛围中，我们学习着一门外语，一切似乎自然而然。

其实，王老师有一套教学法。我们班当年的英语课代表最近提起：每节课的头十分钟，王老师都请当值的两名同学用英语做“报告”。或是讲天气，或是说说班上的事，“大家积极性都很高”，互相比着看谁说得更多更好，“对大家运用所学知识进行表达有很大促进”。学外语是要拿来用的，这简单的道理从一开始就在我们的课堂上实践着。

我对王老师有个印象，应该是初一时就留下的，那就是她的“招牌表情”：她嘴角微微抿着，脸上总是带着浅浅的笑容，那是善意谦和的笑。也许正是王老师的微笑，令课堂氛围平和友善，让外语学习轻松自在。

一位同学最近回忆，王老师在课堂上有个“突出的特点”：她对提问答不出或答错的同学从未有过半点责难，反而自己连声说：sorry， sorry，“显现了极大的包容和慈善”。我想，在有了很多的人生阅历后，我和我的同学们回想起当年一位有着仁慈心的师长，会抱有格外的敬重。

一位同学忆起，我们在初一不但学完了规定的教材，还学了一些课外的东西，其中有Alice in Wonderland（爱丽丝漫游记）——我想那一定是简本。王老师还教我们唱英文歌曲。学年结束时，一些同学代表我们班在家长会上做了汇报表演，这位同学的父亲也是教会学校毕业的，精通英语。他看了表演后对女儿说，你们在一年里真学了不少的东西。

当年唱英语歌的回忆引来同学的热情回应，有人写下唱过的一段歌词：“when I was a child and a little girl……”，一位同学居然在群里引吭高歌，英文发音字正腔圆，而她后来的工作与英语并不搭界，大家纷纷点赞，相约下次见面要一起唱王老师教过的歌儿。

一晃就上初三了，王老师又来教我们英语。过去的一年里（1964年—65年），“革命化运动”已经在学校开展，虽然没停课，但开会多了，班里开，年级开，全校开，经常占用课外文体活动时间。班上开会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暴露思想”，十几岁的孩子就得自我批判，就要改造思想。小学时，我们被看做是“祖国的花朵”；现在的提法，是要培养我们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要“反修防修”，要解放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当好“接班人”首先得改造自己的思想，“阶级斗争”观点成为我们认识世界的基本武器。那个时候中国农村在进行“四清”，城市在搞“社会主义教育”，学校的“革命化运动”是其中一部分。今天回过头去看，它们都是在为文革“热身”。我写过的一本小书《动荡的青春》里，对记忆中的“革命化运动”有比较详细的描述。

事情发生着微妙而深刻的变化，它不但在悄然中影响着同学之间的关系，也影响着师生间的关系。有些老师会主动关心我们的“政治思想”，这叫“教书又教人”。我就被一位不是我们班主任的任课老师找去谈话，他说我的精神状态有些萎靡，“不像毛泽东时代的青年”，那时我十四、五岁。

愚钝如我，也能感觉到王旭老师跟我们的关系和在初一时有些不一样了。在课堂上她仍然一丝不苟地教课，但课后，她似乎避免和我们有更多的接触，在她依旧和善的笑容里，隐隐含着一些距离。相比那些主动跟我们讲革命大道理的老师，我心想，王老师是教书不教人啊。对那些爱教导人的老师我敬而远之，对王旭老师的“不教人”我没意见，但她对我们变得有些客气的态度让我有点困惑。又不知在什么地方看到“夹着尾巴做人”的说法，就暗忖，王老师是在夹着尾巴做人。同时也会想，小学的那些老教师们现在也都夹着尾巴做人了吗？心中有些怅然。

不久就文革了，学生们被鼓励给老师贴大字报。没有印象班上同学给王老师写过大字报。我们这个班从总体来说，“革命斗争性”不强。工作组时期，我们有过一场辩论，是关于文革该怎么搞，“疾风暴雨”式还是“和风细雨”式？同学分两派，各执一词。我们这一派主张要与人为善，对待有问题的人——当时的前提是老师们都是“有问题的”——要耐心细致，不能采取激烈斗争的方式。在辩论中，记得我把王旭老师作为假设的帮助对象。她慈眉善目、温文尔雅、说话轻声细语，我说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治病救人”吗？要帮助像王老师那样的人，就得和颜悦色，在方式方法上要“和风细雨”，这样才会有效果。两派都在毛泽东著作中寻找支持自己观点的论据，也都能找到。

有同学记得，那时班上有人提议请王老师去北海公园，在倒映着白塔的“海”面上我们一边划船一边给老师做“思想工作”。都什么时候了，我们怎么总是忘不了“让我们荡起双桨”？

“和风细雨”绝非干革命的做派，“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很快，“疾风暴雨”骤然而至。1966年8月5号，是师大女附中历史上永远的校耻日。那天下午我不在校园。7月底工作组撤离后，考勤松弛了，特别是对像我这样所谓出身“红五类”的人来说，找个茬儿就出校门了。不记得为什么我后来又回到学校，多年后追忆再三，觉得我进入校门的时间应该在下午五点钟左右。

出事了！看到迎面走来的数位师生后我告诉自己。她们一个个神情有异、行色匆匆。

这时王旭老师低着头快步走来，她紧贴着墙边，缩着有些驼背的身子，好像竭力想把自己变小，我们两人的目光短暂地对视了一下，那一瞬间，我看到了老师满脸的惊恐。“八五”出事时我不在现场，但我几乎在第一时间感受到了当时的氛围。

在记忆里，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王老师。

1968年底，我被分配到山西山阴县插队。在过去的两年多里，国事家事颠三倒四、面目皆非。我很少想起教过我的老师们，也不常去学校——学生生活已经距离我们十分遥远了。

毕竟年轻，插队一二年后，我们适应了田间的劳作，加之雁北地区冬闲时间长，村里有高中知青开始拿起了教科书，带动了初中生。没有功利目的，看不到前途在哪儿，没指望有朝一日能再返回校园、甚至返回城市，只是因为尚余精力，因为渴求知识——那时候我心中总会响起高玉宝“我要读书！”的呼喊，求知几乎成为我们的本能诉求。在天高皇帝远、相对自由的雁北乡间，我们开始了自学。

我捡起了英语，因为周围知青的影响，也因为在我们那个穷乡僻壤，可以不费力地接收到各种“敌台”，没人管。我成了VOA的经常听众。他们有个节目，叫Special English，语速很慢，词汇量限制在两千字左右，内容是美国早期历史。我吃力地跟着听，慢慢地听出点门道。我赴美留学最初学的是美国历史，与此有关。

光听不行，还得看和读。不知从哪儿弄到一本英语教材，程度很浅，生词旁注有国际音标。这时候，我想起了王旭老师，当年是她教我们识读音标。回到记忆里的王老师带着她的招牌微笑，一切都恍如隔世。我已经有至少四年没碰过一丁点儿英语了，以为它从我的头脑中彻底消失，没想到我这个当初不咋地的学生居然连国际音标都没忘！借助音标去拼读生词，仿佛有了一根拐棍，拾起英语来并不困难。

有个说法：如果英文发音好，可以“一俊遮百丑”。我在村子里一个人诵读课文时，没人给我纠音，无从知道自己的发音是“俊”还是“丑”。后来知道了，我的发音还不错，上大学后我的专业是英语，老师基本上不用给我纠音。听中学班里其他同学说，她们的发音也曾受到别人的赞扬。

改革开放初期，我在北京一所外语专科学校教英语，从ABC教起。在课堂上我常常是唇焦口燥、顾此失彼，时不时跟学生着急上火。我们是小班教学，一个班只有十四五名学生，每天两堂专业课，配备有录音机等现代设备，课上课下都能使用，但是，要给每个学生语音语调阶段打好坚实的基本功，委实不容易。

这时，我会纳闷，当年王老师是怎么教的？我们那个班有四十几名学生，没有录音机一类的教学辅助设备，我们和英文的接触，就是课堂上那几十分钟。但就是这样，一门外语在我们不少人头脑中扎下了根。作为教师，能够举重若轻般的让学生们在轻松自然的状态下掌握学习一门外语的基本技能，这是真本事。

到美国后，我学的是历史，拼的是英语；工作以后，英语是我谋生的基本工具。当有人问起，你的英语是怎么学的，我会回答，是在中国时一位中国老师教的。

学生中一辈子受惠于王老师的不止我一人。一位上山下乡时去东北兵团的同学在群里写道：“我在北大荒能教英语，受益于王老师的教诲，凭着我们学过的语法和国际音标，再加上自己的努力，克服了许多困难，能够顺利地完成任务。衷心感谢当年王旭老师耐心细致的教学，使我的基本功还行，一个人撑起英语教学，语音语调竟没有出过大问题。”这位同学以后没有机会再进大学。她曾多年在北大荒教当地孩子英语，退休后在北京，还在所居社区为老年人教英语，凭的是王老师打下的厚实底子。

百年校庆之际校友们纷纷回忆我们的老师。王旭老师在众多教师中并不突出，不是名师。她来自旧社会，也许还背着“历史的包袱”——当初女附中应该有一些这样的教员——她/他们“夹着尾巴做人”，兢兢业业工作。在课堂上，王老师并非妙语连珠、风采四溢，如果说她的教学风格有什么特点，那就是认真严谨，朴素平实，润物细无声。

五十年前，我曾对王旭老师有过“教书不教人”的“评语”。那时，文革将至，“山雨欲来风满楼”；那时，我是不谙世事的少年。今天，我希望能对王老师说，您也许已经不记得我这个学生了，但您不仅是令我终生受益的英文老师，您的敬业、您的善良、您的低调和内敛，也永远是我做人的榜样，您是我感念不尽的恩师。■

【述 往】

抢 粮

——成都支农往事

蔡 楚

1961年3月初，我就读的成都工农师范学校，举校师生奉命去成都近郊支农。说实话，后来才知道，那次支农就是帮助当地山区农民把地里的小麦收起来，再把红苕、洋芋（土豆）或玉米种下去，以免山区农民大批饿死。

全校师生，以毛月之校长带队，打着旗帜、背着行李，步行了约25公里；清晨从成都小税巷出发，经过由城里到山上，全是上坡的碎石路，还有5公里崎岖不平的乡间小路；直到傍晚才到达龙泉山脚下的龙泉公社八一大队。我们班被分在八一小队的仓库里居住，直到半夜才安顿下来。

小队的仓库是一座大四合院，正房由班主任吴庆月老师和女同学们居住，男同学不到十人，就住在正房右边的耳房内，床用木头和竹子搭建。小队的单身会计（党员、兼民兵队长）住在右侧的厢房里，小队长一家住在左侧的厢房里，正房左边的耳房内住着“跳神”的观仙婆母子俩。院子中间有一个宽大的晒坝，院子前门外有几级石阶梯。院子从不关门，正房也没有门，估计这些门已被小队公共食堂劈柴烧了。院子侧门通往长着松树和荒草的坟坡，正房的后边几乎就搭在坟坡上。



同学们每天下地劳动，那时地里的野草长的比麦子高。社员们几乎都患一种因饥饿脱水而引起全身浮肿的水肿病，特别是小孩，肚皮像个气球。他们下地就手捧不太成熟的麦穗不断的搓，搓出麦粒就送进嘴里。我们下地种红苕块用来

（1961年作者与刘元知合影）育苗，社员们就去挖来生吃。当时，我不懂事，不理解社

员们的这种举动，常去劝阻他们说：“你们这样，秋天吃什么？”有一次还差点与社员动起手来，好在被老师和同学们拉开。当天傍晚，毛月之校长知道此事后，把我带到小队公共食堂去看社员们吃什么。他说，你去看看社员们现在吃什么，就会明白他们的举动。当时，社员们担着木桶，在一口大铁锅前排队，小队的单身会计正用一只带把的大木瓢，把稀饭分到每家的桶里。我凑近一看，稀饭里几乎不见米粒，上面漂着几片莲花白老叶子。我终于明白了社员们的举动就是为了活下去，这就是后来史家评论的“大锅清水汤”。

没过几天，班主任吴庆月老师通知我和刘元知同学回成都小税巷，拉本班的粮食、蔬菜和副食品到八一小队。那时缺吃少穿，城市中的粮食、食用油、蔬菜、副食品，甚至盐都是限量凭票证购买的。生活中的工业日用品也凭票购买，如，布票、煤票、肥皂票、自行车票等。民众中辛酸地调侃道：“除了自来水不要票，其它都要票。”虽然，早在1959年大跃进高潮中，政治老师在课堂上就教育我们说：“中国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到1962年，人民的生活将极大丰富，我们除了吃穿住行由政府包干外，还每人每天有半斤白糖及饭后水果……”但到了1961年，我们不仅见不到白糖，却还凭票限量购买进口的红黄色的古巴糖。而且城市中还饿死人。当时，我们学生每人每月定量供应大米或麵粉30斤、（强制性“节约”2.5斤，故只剩下27.5斤）肉类半斤、菜油3两、加上每人每天配给半斤蔬菜。既然由粮店菜店配给了，就需要由城里往乡下拉。送食品的工具是板板车，每周送2——3次，每次重量几百斤不等。由于都是上坡的山路，道路崎岖不平，由16岁左右的学生来承担这样的任务，其艰巨的程度可想而知。一次，早上我俩在学校只吃了点厚皮菜稀饭就出发。下大面铺的长坡，由于我俩力弱，刹不住板板车，造成车翻，车上食品滚满公路。好心的当地农民帮助我俩翻转板板车，捡起食品并捆绑好，我俩才再次上路。好在人没有受伤，食品没有损失。到了队上，毛校长闻讯后，首先关心食品有没有损失，使我和刘元知同学很失望，认为毛校长不重视我俩的生命安全。

坚持拉了3个多月，我与刘元知同学已疲惫不堪，但仍经常承担这种长途运输任务。七月一日，是共产党建党四十周年的生日，我与刘元知同学从早上三点钟就出发，直到晚上

十一点才把几百斤重的食品，在月光下拉到我们班的住地。当晚，由于是节日，食堂给我俩留了两份粉蒸肉和米饭，我俩吃完饭刚躺在床上。突然，女同学的房间内传出一声惊叫，接着听到房顶上发出一阵揭瓦声，我和刘元知翻身下床冲出侧门，一个瓦片从我右耳边呼啸而过，吴老师高叫：“危险！蔡天一回来。”，由于松树遮盖，看不清楚后面坟坡的小路，我只好返回。这时，院子里已乱成一团。经过七嘴八舌的议论，吴老师和同学们认定是有人“借粮来了”。原来，近来龙泉山区盛行“借粮”，每个队到别的队借粮。所谓借就是抢，有时还发生集体哄抢，把一块山坡上，没有成熟的玉麦（玉米）借得精光。

闹声吵醒了小队的会计。他出侧门看了看，回来说，正房的小竹楼上有几箩筐队上的粮食种子，他叫我用梯子上去看看是否还在。我上去看有四箩筐洋芋和玉麦，会计说，没有少，可能这些人今晚上还要来。他回房拿出一枝三八式步枪，在月光下擦拭，吴老师和同学们才安心回房睡觉。

大约半夜四点，女同学的房间内又传出一阵尖叫声，模糊中我急忙起来，透过窗棂看到三个男人已穿过前门走到大晒坝上。月光照耀下，他们的大砍刀闪着寒光。说时迟，那时快，小队会计冲出房门，向空中开了一枪，三个抢粮者闻声仓皇逃窜。女同学们吓的放声大哭，直到天亮才逐渐安静下来。

第二天早上起床后，我去找观仙婆借了一把菱形尖刀，用来防抢粮者。小队会计看到说，没用，还是步枪管用。他带我到坟坡去看，见到正房顶后边的瓦坏了不少。会计说，这是罪娃子（贼）搞的。吴老师见我和刘元知同学都很消瘦，就叫我俩不拉车了，换两个男同学拉。她注意到我的双腿发肿，就叫我每天不用出工，留在院子里看守队上的粮食种子。由于整天在院子里，我开始记日记和学写新诗，吴老师看过我和刘元知同学写的新诗，评论说：“玩世不恭，少年老成。”在院子里，我还目睹过一次，小队会计的母亲在敲他的房门，但会计始终不开门，他母亲哭着叫喊：“老天爷呵，儿子不认亲娘啦”。从他母亲的哭喊声中，我断断续续听出，他母亲因为挨饿来投靠他，但他不收留。

后来，听女同学冯媛成摆谈，才知道2班的住地也遇到抢粮者，而且有一群人。在大

白天高呼着：“借玉麦来了”，把2班看守玉麦地的女同学打倒在地，把没有成熟的玉麦“借”得精光。好在该女同学只是受到惊吓，为使同学们不发生意外伤害，毛校长取消了看守玉麦和洋芋地的值班任务。同时，同学间还传闻公社供销社的粮食和食油也被“借”得精光，公社粮仓已有荷枪实弹的民兵看守等等。

当时，队上地里的蔬菜主要种植莲花白和厚皮菜。由于种下后无人管理，莲花白不卷心，老叶子居多，还爬满一种变蝴蝶的青虫。南瓜不施肥，也不结果，由于没有食油，小队公共食堂每次煮饭前，南瓜叶用来擦生锈的大铁锅。一次，傍晚休息时，我用捉来的青虫在小山沟里钓鲢鱼，听到沟对面的坟场传来一阵哭泣声，抬头看，几个人披麻戴孝在埋饿死的亲人。由于见惯了当时“新坟叠旧坟”的惨状，我没有在意。突然一声“打倒共产党！”的呼声把我惊呆了。我长到16岁，这样的呼声第一次听到。我马上停止了钓鱼，站在沟边观看。结果再没有听到呼喊，估计这些人由于饥饿，连呼喊的力气都没有了。虽然，他们于惨痛中发出的一声呼喊，埋没山中没有其他人听到，但对我却石破天惊，终生难忘。

8月初，学校从乡间撤回。走时，小队公共食堂已取消。我所在的生产小队只剩下三户没有饿死人的完整人家。一户是小队长家，一户是单身的会计家，另一户则是“跳神”的观仙婆母子俩。回校没有几天，奉上级“关停并转”的命令，8月8日成都工农师范学校宣布停办。后来，我没有回过龙泉公社八一大队。十年后，听当地到城里做泥工的乡亲说：“四清”中那位会计被检举揭发有多吃多占的行为，被作为“民愤很大”的“四不清”干部逮捕入狱，判刑劳改。那位观仙婆的儿子，因出身成份好已参军。

当年江苏的民谣：“毛主席大胖脸，社员饿死他不管。”四川的民谣：“说大话，使小钱，卖勾子，过大年”。四川荣经的民谣：“伙食团，摆坟山；人吃人，断炊烟”。

那位会计就是党的基层的替罪羊之一。■

2016年9月18

【述 往】

一个老红军的文革遭遇

裴文秀 黄永辉

编著者说明：

黄永安，广西河池凤山县人，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分农民，1926年参加革命。文革前是铁道部驻柳州铁路局特派员，柳州铁路局副局长。

文革前期，曾指派某政工干部参加工机联，以帮助造反派避免过激行动。后响应中央号召，亮相支持柳铁工机联。参加过一些群众大会。

文革中后期遭受残酷迫害，不幸去世。其亲属广受株连。

因为黄永安已去世，以下文字共包含五个材料，前四个根据黄的遗孀裴文秀和其弟黄永辉的上诉材料影印件原文实录，个别字句有改动。隐去了部分人物的姓名。

第五个系柳州铁路局关于黄永安的结论给自治区的报告，亦系影印件原文实录。

一、关于黄永安同志受迫害情况的报告

黄永安同志系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专区凤山县人，家庭出身贫农，1926年参加韦拔群同志领导的农民自卫队，1930年自卫队在原籍改编为红军。193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将自己的一切交给了党，交给了革命，投身到全人类的解放事业中。

黄永安同志原是铁道部驻柳州特派员，柳州铁路局副局长。

1966年，（原文有涂抹）……但是，林彪及四人帮一伙出自反动的本质，无情地打击和迫害老干部，老同志，他们在柳州铁路局的代理人，对黄永安同志也实行了残酷的迫害。下面是迫害的实情：

1968年初从北京来了两个军人，要黄永安同志介绍谭震林同志在瑞金的情况，想把谭

震林同志打成叛徒。黄永安同志看穿了他们的阴谋，宁可遭受法西斯般的毒打，也不肯伪造材料。于是被他们关进专政队，诬陷为谭震林叛徒集团的成员，施以残酷刑罚。打断了黄永安同志的锁骨，腰椎骨，并扣上“叛徒”、“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等罪名的帽子。

对黄永安同志的亲属也施以残酷的迫害。将全家抄家赶走，每个人身上除穿的之外，其余的一概抢光。全家七口人，分成六个地方到处流浪，无家可归。甚至连收留我的朋友，也被打骂。黄永安同志的叔伯弟弟黄永雄，被扣上“判徒弟弟”的罪名，乱棍打死。另一个叔伯弟弟黄永辉的儿子黄荣利，刚从部队转业回来，也被关进牢房折磨而死。还有一个侄儿黄荣胜也被乱棍打死。

1968年9月10日，哈尔滨伪市警察署长的女儿、伪警长的老婆回某某，把我抓到托儿所的小房子里毒打。此事由女工部干事杨某某操纵，夏某某、曾某某参与打人。我全身的衣服都被打成了条条，血把衣服和肉粘在一起。不给吃，不给睡，我多次昏死过去。然后被丢在一个小房子里喂蚊子。一个月后，我刚能动，就将我和十岁的小女儿一起送到专政队，监督劳动。

1971年3月20日，他们又给黄永安同志扣上“五一六分子”的帽子。物资处王某某的老婆贺某某到家中来“勒令”黄永安到东泉五七干校去，实行隔离审查。五月份，黄永安患有严重肝病，经医生检查需要住院治疗。但他们不给治疗。直到10月19日，黄永安同志实在支持不了，才给住院。名义上住院治疗，实际上是住院写检查。四个人“陪”他住在医院，轮流监督他写检查。对他逼供信，不让他休息。他已经七十多岁，身体又有重病，况且只有一只左手，在他们的威逼下，流着眼泪，一遍又一遍无休止地写着检查。我想去照顾他，也被无理拒绝。

他的老战友（名叫何畏，南京医药公司党委书记）写信来了解他的情况，我转给他后，他们就逼他写了一封信，假称问题已经解决，要他们放心。老鼠怕见阳光，他们就是这样，做贼心虚，不敢将真实情况说出来。待战友回信，向黄永安同志祝贺他的问题解决了时，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含着眼泪说：“是他们逼着我写的呀！”

12月，黄永安同志病未好，反而加重了。但他们还是逼他又到干校去劳动。头天我去送饭，见人还躺在床上，第二天去，就不见人了。不知被他们送到了什么地方。连家属都不通知一声。还把我狠狠地教训了一顿。我流着眼泪回到家里，就气昏过去了，一天后才苏醒过来。

1972年3月1日，经医生检查，黄永安同志的肝病已有转化成肝癌的可能。五月才从干校放他回柳州治疗。黄永安同志坚持和普通工人住在一个房间里，以便暴露他们在医疗方面对他的摧残。住院期间，内科主任交代医生，黄永安的病不由你负责，由院部安排治疗。这哪里是治疗，纯粹是应付。在他们的迫害下，病情愈加恶化。经我们多次要求，才同意转到南宁医学院治疗。1972年七月，由我儿子及儿媳妇陪同照顾，到了南宁医学院治疗。经多方检查，确诊是肝癌后期。他们才假惺惺地去讲：“病好后，就不用再去干校了，在家休养。”

10月份回到柳州，他到家后的第一句话，就是问我：“老裴，我的三个月的党费交了没有？”我说：“没有交。”“赶快拿五块钱去给我交党费。”又告诉我说：“你去告诉党组织，我想见见党的领导。我想说几句话。”但没有一个党的领导来看黄永安一眼，没有一个人愿给黄永安讲一句话。他最后告诉我说：“你要向上级党反映我的情况，告诉党，我是被他们迫害死的。党委派我的特派员证让他们抢走了。快点报告党中央。”并要我转告组织上，希望恢复他的组织生活。黄永安同志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也念念不忘党。是党把他引上了革命的道路，是党把他培养成一个忠实的革命战士，他心里装着革命，想着党，唯独没有他自己。

11月4日凌晨3时，党的忠实儿子黄永安同志与世长辞了。他的一生，是光明磊落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

我儿子和媳妇虽经批准去照顾父亲，但仍然被扣发了四个月的工资，分文不给。

黄永安同志去世后，我儿子曾去找铁路局政治部主任某某某，他却说：“死就死了，死了还不如一条狗。”我说我们是来解决问题的，你说话这么难听干什么。我看他对一个

老红军战士，一个革命残废军人，是这个态度，我就走了。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作为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长期隐瞒家庭成分，直到1966年被组织发现后才交代的某某某，是不会有有什么好话的，我们只好默默地走开。

1972年8月份，我曾到北京上访，但被骗说已经解决了，要我回来。回来一看，一切照旧。就曾多次写信，但一直未见回音。现在我们才明白，原来是“四人帮”及其一伙搞的鬼。难道说，这冤就如石沉大海一样，永远不得伸了吗？

雄鸡一唱天下白。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全国到处喜气洋洋。我认为黄永安同志的冤案应该是真相大白的时候了。他们所做的结论完全是颠倒黑白。黄永安同志在武斗期间曾被部队带到湛江，后又转到北京保护起来，根本未参加武斗，更不是什么武斗指挥部主要成员之一。这完全是他们逼供信伪造的材料。我恳切地希望组织上对黄永安的问题重新做调查，以做出正确的结论。

柳州铁路局退休职工、黄永安亲属 裴文秀 呈

（（原文没写日期）

二、要求落实政策

黄永安同志系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专区凤山县老里村人，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分农民。1926年参加韦拔群同志领导的农民自卫队，1930年自卫队在原籍改编为红军。193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同黄永安同志一起参加红七军的六十个同志，解放后就剩下两个，黄永安是其中之一。

一、黄永安同志简历：

1930年——1931年，红七军五师五八团三营九连任战士、班长；

1931——1934 红七军五师五八团三营九连任班长，指导员；

1934年在江西广昌战斗负伤，右手被截肢；

1935年在瑞汀打游击，当战士；

1937年在新四军二支队任通讯连指导员；

1939——1941年任新四军第四兵站指导员；

1941——1946年 新四军一师后方医院任指导员、协理员、副院长；

1947——1949年 在华东荣校十分校任校长；

1949——1952年在济南铁路局任蚌埠公安处处长；

1952——1961年在济南铁路局任总务处长，客运处长，副局长；

1962年 调到柳州铁路局任副局长。

二、以调查谭震林同志材料为起因

1968年初从北京来了两个军人，铁路局军管通知黄永安同志介绍谭震林同志在瑞金的情况。林贼和“四人帮”的目的在于想把谭震林同志打成叛徒。黄永安同志看穿了他们的阴谋，宁可遭受法西斯般的毒打，也不肯造假材料陷害对革命有功的老同志。于是这些法西斯匪徒对黄永安同志进行轮番逼供。黄永安同志还是不低头，不捏造假材料，于是被他们关进专政队，施以残酷刑罚。如同中美合作所的特务一般，打断了黄永安同志的锁骨，腰椎骨，并从此给黄永安同志扣上“叛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等罪名。

同时对黄永安同志的亲属也施以残酷的刑罚。给家属扣上叛徒老婆、叛徒儿子的帽子，连十岁的小女儿也不能幸免，被扣上叛徒女儿的帽子，打得无处躲藏。

1968年5月5日黄永安同志被抓走。8月8日来了十几个人，把我家的东西抢劫一空。将党中央给黄永安同志的特派员证也抢去了，至今下落不明。将我家扫地出门，全家七口人，分成六个地方，到处流浪，无家可归。我们走到哪里就被打骂到哪里。甚至连收留我们的朋友也被扣上同情叛徒家属的罪名而被打骂。我住在铁路招待所，带着一个十岁的小孩，又被贾某某抢去了手表，及身上仅剩的100元生活费用和粮票。

1968年9月10日，伪哈尔滨市警察署长的女儿、伪警长的老婆回某某，把我抓到托

儿所小房里（当时在场的还有成述之），和一个膀粗腰圆的男人一起，对我逼供信。要我跪倒在他们面前，我不向他们下跪，我只跪倒在毛主席像前。他们气急败坏的把我打得死去活来。整个上半身都打成了紫色的，痛楚不止。没打死我他们又叫人活受罪，白天不给饭吃，晚上不让睡觉，全身被蚊子咬的针都插不进去。把我打昏死过去以后，把我拖到运校，苏醒以后又打。又昏过去，又把我拖到铁一小，苏醒以后又打。他们想置我于死地。被我小孩弄回住处以后，我十多天后才能动弹。他们为什么对我施以毒刑呢？

因为我们是共产党，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打倒了他们的反动政权，他们无时无刻不想着复辟，对我们进行报复，企图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

三、一计不成，又施更毒的计。由于黄永安同志不为他们捏造陷害谭震林同志的假材料，他们又给黄永安同志捏造了一个新罪名，扣上“五一六”分子的帽子，把他抓到东泉五七干校隔离审查。

（这部分内容与前文基本相同，从略）

雄鸡一唱天下白。华主席和党中央打倒了四人帮，全国人民欢天喜地，我们更加欢天喜地。四人帮对革命老干部迫害的真相该到大白的时候了。我要求上级党给我做主，要求将周总理批给黄永安同志的2000元钱（安家费）查清，到底是哪里给侵吞了。

今年（注：1978年）4月18号我到铁道部上访。5月18号回柳。6月14号，柳州铁路局审干办公室的同志来请我到铁路局，就黄永安同志的问题共同商谈，看我们有什么要求。到今已和我们谈了四次。但是他们至今没有给予正确的结论。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全国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越做越好。可是柳州铁路局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仍然毫无进展。说什么“我们这里四人帮没有直接插手。”“黄永安同志是有错误”，根本不想彻底解决问题，总想留尾巴，找点所谓理由，生怕否定了自己。而这些人过去对黄永安同志搞法西斯式的审查，搞逼供信，逼黄永安同志承认错误，现在借此大做文章，抓住不放，硬说黄永安同志“有错误”，不给予正确结论。连受牵连的家属、子女、亲友，也不给予解决。尤其是在黄永安的老家，受黄永安的影响，就死了三条人命。下面就说说他们受迫

害的事实。

(这部分内容从略。参看黄永辉的申诉材料)

凤山县当时每个大队公社各机关单位到处都设有公堂和监牢，每个大队、公社、单位，都有权打人杀人。在此，我们要求党中央给我们做主。

柳州铁路局副局长 黄永安家属裴文秀

1978年8月12日

三、黄永辉的申诉材料

我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凤山县乔因公社老里大队老里村人。出身贫农，文盲，中共党员。解放前给地主当长工。1947年参加革命，任排长。1950年转业到地方工作。历任凤山县平东区区长，民政科科长至文革前。

1968年8月29日，由于大哥黄永安（原柳州铁路局副局长）被打成叛徒、走资派，我受到株连，被扣上所谓“反共救国团后勤部长”的罪名，逮捕坐牢达15.5个月之久。关押期间，对我进行了法西斯式的毒打和摧残。有一次，从柳州铁路局来了三个家伙，要我承认大哥黄永安是叛徒，又要我承认黄永安曾用拖拉机运来五四手枪到凤山。这是无中生有的事，我没法承认。其中一个家伙就掏出手枪来威逼我说：“你承认不承认，不承认就把你干掉。”我回答说：“要杀很容易，随你的便。但没有的事我不能承认。”

1968年9月27日晚，（凤山县革命委员会是1968年8月25日成立的）在革委副主任邓成的指挥下，覃彩珍、潘绍仁充当打手，把我从监牢提出来，在县委礼堂进行残酷斗争。先用麻绳将我的两只手的小手指分别捆住，再用三十多斤重的石头吊在麻绳中间，每边两个人使劲往后拉，直到手指上的皮和肉被剥下来，只剩下骨头和筋，然后用木棍打，皮鞋踢。直到我昏死过去，又用冷水泼我，才将我抬回牢房去。醒来后，我才知自己的筋骨被打断了。

1968 年 11 月的一天，他们召开了一个所谓“归口闹革命”的大会，把我和我的大儿子黄荣利提出监牢来斗争，给我们挂上黑牌子，我的黑牌子上写的是“反共救国团后勤部长、反革命分子黄永辉”，我儿子的黑牌子上写的是“反共救国团指挥长、反革命分子黄荣利”。出到监牢门口，公安人员黄定才就给我们父子都照了相。到礼堂门口又照了相，到斗争会上又照了相，并且画了幅漫画。当天在大会上，邓桂白（现在是物资局长）宣布我的所谓罪名。

我的弟弟黄永瑄，贫农，中共党员。1947 年参加革命，1955 年转业到地方，先后在商业和粮食部门工作。他也受大哥问题牵连，工资调整中，被扣上“反属”的帽子，一直不给调整。他本人是病残，在工作中不断受到种种打击和刁难，逼得没办法，只好在 1973 年被迫辞职回家。黄永瑄的儿子黄荣飞，原来也是非农业人口，被非法收去了购粮证。

我的小弟黄永雄，中共党员，1956 年桂林师院毕业，1960 年又到广西民族学院进修，1964 年参加四清工作队，结束后分配在凤山县支行工作。因为大哥和我的问题受到株连，被扣上所谓“反共救国团”的罪名，于 1968 年 11 月 3 日（农历九月十三日）被从单位宿舍拉去活埋。以凤山县支行的黄某寒（乐业县人，地主家庭出身，1962 年被关押过）为首，用绳子把我小弟捆起来，用锥子把他的眼睛挖出来，又用木棍把他的牙齿打落，才拖去活埋。和我小弟一起被埋在一个坑里的，还有张竹乐（女，县百货公司干部），黄玉勤（女，县百货公司干部），刘定湘（干部）。小弟被害后，家里东西全部被抢光，留下两个孩子。现在国家负责养一个，每个月六元钱，只养到十三岁。

我的大儿子黄荣利，共青团员，1959 年参军，在海南军区 7001 部队司令部任文书，曾荣获五好战士标兵称号。1964 年转业，参加四清工作队。四清结束后，分配在民政科工作。也由于我和大哥的问题受到株连，被扣上“反共救国团指挥长”的罪名，于 1968 年 8 月 29 日被逮捕坐牢。1968 年 11 月被拉出监狱斗争。挂上黑牌子，被公安人员连续三次照相，然后拉到各地乡下，在全县内游斗了 18 场之多。身心受到严重摧残。1972 年 7 月宣布将他放回单位。不料就在 11 月 3 号，突然嘴巴鼻子直流黑血。就这样死于监牢。

我的侄儿黄荣珠，共青团员。1960年中师毕业回乡，1965年由县教育局聘请，参加教育工作。先后在乔因公社久加完小、额里完小任教。也因我和大哥问题受到牵连，被扣上“反共救国团”罪名，被逮捕关押五个月之久。在此期间受到种种法西斯式的毒打残害。1970年以后……（此处原文残缺）罪名，不给恢复工作，解职回乡。现在他本人还保留着购粮证和各种证件。

打倒林彪“四人帮”已两年多时间，在这期间，我也曾多次向组织要求正确处理我一家的的问题，但凤山县革委会不但不给我们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反而给我们施加压力，再次制造新的冤案，新的假材料。继续对我进行打击和迫害。

我们于1978年12月几次要求县革委会对我儿子黄荣利的问题做出正确处理和结论，但他们没有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解决，而继续强加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完全没有实事求是的公正态度。他们从帮派体系的角度，罗列了几个罪名，于1978年12月14日定我儿子黄荣利为反革命分子。罪名说，他搞打砸抢，抢劫银行、粮食，冲入武部，打伤解放军，破坏通讯线路，炸公路等等。这些都完全没有事实。试问，说他搞打砸抢，抢劫银行、粮食，到底他抢了哪里的银行、粮食，抢了多少钱和粮食呢？都没有任何事实。而他们自己，早在1968年1月18日，就开始做大规模武斗的准备。他们这些帮派势力首先把乔因公社的粮食抢上山，又把县里巴榜粮仓炸毁抢粮，炸毁县糖业部门的仓库，把物资抢光。又把田阳县几个车皮的货物抢光，还有拦路抢劫，还有杀人放火，他们杀害我凤山县革命人民、革命干部共三千余人，并在1968年烧了城厢公社坡心大队那茶屯的民房十间。这些难道不算是反革命行为吗？为什么他们这些所作所为，不受惩罚，反而升官发财呢？

扣给黄荣利的罪名说，他冲入武部，杀解放军，也没有任何事实。事情是这样的：黄荣利本人的枪，早就在1968年4月20日被抢去，冲入武部，他并没有参加。至于说杀解放军，杀了那个，打了那个？在哪里杀，在哪里打？这不是无中生有吗？还说他破坏通讯，炸毁公路，可是在凤山武斗中，并没有哪里的通讯被破坏，也没有哪里的交通公路被炸毁过。这些都是无中生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国人民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积极落实党的方针政策，为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革命干部、工人和其他革命群众给予平反昭雪。我家的的问题已经九年了。我县因一派掌权，不予解决。我请求党的领导机关对我们一家的冤案予以昭雪，平反，给我们恢复名誉。

申冤人 黄永辉

1979年1月

四、对“关于黄永安同志问题的审查结论”的意见

作为黄永安同志的家属，我们对柳州铁路局“关于黄永安同志问题的审查结论”有如下意见：

“结论”中说，“黄永安同志因为个人主义作祟”而犯了一系列错误。我们认为这是对黄永安同志的污蔑。黄永安同志是出自对党和毛主席的热爱，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结论”中强加的罪名，无非是说黄永安同志利用文化大革命以实现个人的某些私利，但又找不出任何根据，同时与“结论”中所讲的“黄永安同志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兢兢业业，艰苦朴素，作风正派，联系群众，平易近人，他热爱党，热爱毛主席，为革命为党为人民做出了贡献”相矛盾。黄永安同志一贯来总是认为自己对党对人民做的贡献太少了，而党和人民却给他如此高的职务和待遇，心中很惭愧。决心为党为人民做出更多的贡献，以报答党的恩情。不顾年高身残，主动要求到现场参加劳动。我们有什么理由给这样的同志扣上个人主义的帽子呢？

关于参加1967年“7.28”夺军权大会，会前他根本不知道大会内容。“7.30”批判军管会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他作了发言，“结论”中认为这是严重政治性错误。我们认为，他正是响应了党的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罪又何在？林彪及”四人帮”

为了破坏文化大革命，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反动口号，挑起了武斗，广西两派都受到影响。在这中间，黄永安同志讲了一些话，上阵地看地形，对制造土炮出过点子等，其责任在林彪“四人帮”身上。脱开历史背景看问题，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因此，我们认为，在文化大革命中，黄永安同志未犯任何政治性错误。

我们认为黄永安同志是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迫害致死的，必须给以彻底平反。柳州铁路局一直诡辩，说有医院证明，黄永安同志是因病逝世的。正是由于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对黄永安同志进行残酷的政治迫害，精神上的迫害，生活上的迫害，肉体上的迫害，致使黄永安同志积冤成疾，而铁路局又不予以治疗，直到病情严重，无法挽回，才做个样子，送到自治区医学院治疗。去世后，还不许柳铁医院的人传出去。这不是迫害是什么？既然历史早已查清，文革中的问题也查清，而且也承认是“功大于过”，为什么事到如今，还未开追悼会，对一个老红军战士，一个兢兢业业为党为人民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同志如此态度，难道不是立场上的问题吗？

柳州铁路局做出如此的“结论”，无非是为自己的错误辩解，明知错了，还要留一个尾巴，说明自己并非全错。我们绝不同意诸如此类的结论。

裴文秀

黄荣平 刘玉珍

黄荣兰

裴土荣 许淑珍

1978、7、14

五、关于黄永安同志问题复查结论的报告

（自治区）区党委：

黄永安，男，1902年生，广西凤山县人，家庭出身贫农，个人成分农民。1930年6月入伍，1931年六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黄永安同志是党的优秀党员。历任我军政治指导员

协理员，后方医院院长，管理科长，荣军分校长。解放后转业铁路，任公安分处处长，总务处长，客运处处长，柳州铁路局副局长，中共柳州铁路局委员会委员，广西区第二届、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黄永安同志是一位红七军老战士。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为革命流过血，负过伤，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斗争，立场坚定。全国解放后，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他热爱党，热爱毛主席。为党为人民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黄永安同志，政治历史清白。1968年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及其在柳铁的代理人，为了篡党夺权，对革命老干部进行了无情打击，残酷迫害，使黄永安同志的身心健康受到了严重的摧残。故于1972年11月4日被迫害含冤致死。

以上报告当否，请批示。■

中共柳州铁路局委员会

1979年1月8日

此文选自黄玉梅编写《追寻与命运——造反派自述》一书

该书由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香港），2016年12月出版

【书信】

李南央给妈妈的信

1966. 6. 12.

妈妈：

自从你走以后，学校变化很大。现在形势很紧张，每天白天、晚上都有护校的。全市中学都动起来了，我们已停课一个星期。据说升学、毕业都不考了，如果一定要考，我就不打算升学了（这是全市中学生的看法），因为搞运动都来不及，功课根本没时间温。这

次文化大革命机会实在难得，不能错过。

我把你走后学校的情况说一下。工作组说我校情况相当复杂。

原来学生分为两派，后来有些班逐渐向高一靠拢，左派力量大了。党支部一直不出来领导运动，而且把李雪峰同志的报告歪曲得不像样子，精神完全不对。高一便成立了核心小组，掌握学校的一切领导权，水、电、食堂、广播、印刷，全由学生控制。在这时，校长、书记都作了检讨，但都是不疼不痒，把责任全推在前市委身上。

后来团中央派来了三人工作组，在欢迎会上，老师们演出了一场丑剧。书记代表党员讲话，党员代表本教研组讲话，团委书记代表团员讲话。但党员、老师、团员都站出来反对他们的讲话，说他们只能代表自己。许多平时一言不发的党员、老师，突然积极起来，哭天抹泪地大作检讨，捶胸顿足地说自己受了骗，还有人拍桌大骂吕惠芬（我校党支书，在工作组未来以前，她已经被学生斗臭了）。

这时，高一核心小组站出来让大家提高警惕，辨明真假，不要上当。同学们都高呼：真假革命看行动。许多人一起抢麦克风，乱成一团。我们班主任曾沐侯也上台讲话，同学们指着鼻子骂他，不让他讲，他竟厚颜无耻地抢麦克风，揭露了一个“重大事件”：党支书吕惠芬住在旧市委对过（对面）。工作组最后决定会议停止。在工作组到来之前，学校百般阻挠同学去北大声援，工作组来那天，却大开介绍信，让同学都去北大了。等工作组来时，二千学生只剩三百三。工作组来的那天下午，学校着了一次火，幸亏及时扑灭，据说是药品自燃。工作组来那天，曾沐侯表现得惊慌失措，非要出校门，被同学拦住。据我班现在揭露的材料，曾沐侯来头不小，很可能是个反革命。他探取军事情报，压制同学向上级反映学校情况，文化大革命后右派张妙娟和他来往相当密切，他经常躺在床上，叼着烟卷，翘着二郎腿听黄色音乐，对同学有流氓行为。在同学中挑拨离间，在团支委中经常说我、武振华、张莉一些好提意见，不大听他话的同学的坏话。污蔑工人出身正义感强，不受他支使的张莉，是国民党军官出身。他掌握着锅炉房、党支部、化学仓库许多重要地点的钥匙，运动后他搬到锅炉房住，据我们了解，锅炉房里很可能有地洞。他平时没组织

我们学过一次毛选，他的毛选也落了厚厚的一层土。他把毛主席像揉的乱七八糟放在一个破盒子里。他是六〇年为预备党员，六四年转的正。

我校过去一直是旧市委的重点学校，旧市委把我们调到新大楼也是别有用心。党支部吕惠芬传达雪峰同志的报告避而不谈刘仁的撤职，在她和同学的谈话中经常不小心说出刘仁的名字，经常把雪峰同志说成刘仁。她家又住在市委对过（对面），我们估计她多半和刘仁有来往。

新市委最近又由农村四清工作队派来我校一个2人工作队，她们是从农村连夜赶回。由于对学校文化大革命工作没经验，新市委还没来得及给他们作动员报告。雪峰同志的报告她们也还没听到。一到我校就犯了一个大错误，把原来贴的大字报全撕了，底稿也没留下。团中央也给她们指出这是错误的，也正在帮助她们采取补救方法。我校工作组决定成立“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临时学生代表会”，我也被同学选为代表。但已三年没当过“领导”，不会干了，有时总爱发急。同学中不都是左派，意见不统一，像肖香这种人个人主义在运动中暴露更厉害，总想领导运动。她说什么就是什么，同学有时不同意，她就闹意见，说怪话。我平时学毛选又不够，对人民日报社论精神又领会不够，不像你在家，有人给我讲社论精神，一时又辨认不出同学中真正的左派，工作总比较乱。同学也散，班上丢东西现象很多。我的那杆新的金星笔也丢了。我怕由于领导问题，对班里文化大革命开展不利。反正我是全力以赴，踏踏实实地和同学们摸索着干，慢慢地摸出门路来。

现在事很多，晚上经常护校，经常不回家。哥哥也这样。

不知你身体怎样，想你工作一定更忙，责任不轻。

祝：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

南央 1966. 6. 12.

【文 摘】

略谈中国史学的双重职能¹

单少杰

一

每个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都会遭遇一个很难摆平却又必须摆平的问题，即幸福与德行有可能相背离的问题：

一个有福的人未必是一个有德的人，有可能一生屡作恶事；

一个有德的人未必是一个有福的人，有可能一生历经苦难。

一个民族若要维护其社会公正，就必须设法在这德与这福之间保持某种平衡：

对那些有福而无德的人予以追究，

对那些有德而无福的人予以补偿。

反之，若不作这种追究和这种补偿，那些有福无德的人就会无所畏惧，那些有德无福的人就会深感失望。于是，这个民族就会出现价值失衡，只重视幸福而轻视德行；这个民族的许多成员就会在价值取向上，只重视个人私欲的满足而轻视社会公益的实现，只会为了幸福而放弃德行，即不怕作恶——因不受追究；不会为了德行而放弃幸福，即不愿行善——因没有补偿。长此以往，这个民族将因失去社会公正而失去道德约束力，将因失去道德约束力而失去社会凝聚力，将因私欲横流而溃为一盘散沙。

二

至于各个民族如何实现这种追究和这种补偿，似是没有统一途径。

有些民族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宗教途径来实现的：

¹此文出自单少杰所著《毛泽东的执政春秋》一书。文中的小节和下划线是本刊加的，本刊转载时有删节。

让那些生前有福而无德的人死后“下地狱”，

让那些生前有德而无福的人死后“上天堂”。

这种途径在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中得到经典性表述。

我们民族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著史途径来实现的：让那些生前有福而无德的人死后留下骂名，即所谓“遗臭万年”，犹如家出“三世状元”的秦桧。让那些生前有德而无福的人死后享有盛名，即所谓“流芳百世”，犹如生前“披麻带孝”的岳飞。

这种著史途径在“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这句名言里得到经典性表述。

三

1962年6月一天，中南海游泳池畔，毛泽东质问刘少奇：为什么不顶住邓子恢、陈云等人的右倾举动？刘一向顺从毛，但此次竟“有些动感情”地顶了毛：“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引自：《刘少奇、毛泽东和四清运动——刘源（刘少奇子）、何家栋（中共资深新闻工作者）对一段历史公案的回忆、考证》，载《南方周末》1998年11月20日第10版]

从这里可以看出，刘怕毛也怕史，甚至怕毛不及怕史，怕史更甚于怕毛。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正是从“人相食”后，刘开始与毛分道扬镳了。

毛泽东在去世前不久（1976.4.30），自己给自己作“盖棺定论”：“我一生办了两件事”，一是夺取全国政权，“持异议的人甚少”；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参见本书第13节）从这谈话的时间和这谈话的内容看，毛是在推测他死后人们将怎样评价他，并显得有些放心不下。可见，毛也是很在乎历史褒贬的，尽管他常爱摆出一副什么都不在乎的架势：“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刘少奇做错事时害怕历史，受冤屈时也寄希望于历史。他晚年爱说这样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话中自是含有这样一层意思：我刘少奇的是非功过不是由某人（比如老毛）说了算，而要由历史由后人

来评定。

彭德怀受冤屈时也寄希望于历史。他晚年一而再、再而三地书写申述材料，既是向中央申诉，也是向历史申诉——因为他已对那个奉老毛为神明的中央颇感失望了。他在生命垂危中，听到侄女悄声说他的那包材料被保存下来时，先是一愣，接着便欣然地笑了。

显然，他笑在历史将还他以公道。事实也是如此：在现世中，毛把彭押上了批斗台；在历史中，彭则把毛钉上了耻辱柱；并且，这种反差将随着时间推移而愈显强烈，一方愈显冤屈，一方愈显卑劣。从彭与毛的冲突中可以看出，中国政治人物是要过历史关的，他们的较量是要从现世中延续到历史中的，是要在历史中决胜负的。

可是，现代中国仍有一些权势人物似乎不明白这一点，自己还在台上时就迫不及待地自吹自擂，或是纵容属下为自己评功摆好。稍有史识者观其“行状”，不禁想吆喝一声：你急什么？从彭与刘的寄望中可以看出，中国历史学家是负有双重责任的，除了负有澄清史实的学术责任外，还负有辨明是非的道义责任。

四

或者说，中国史学具有双重职能：一是记录历史事实；二是维系人伦价值，故多有道德评价。

前一职能无疑是包括中国史学在内的一切史学都必须具有的职能，也是最基本的职能，后一职能则为中国史学所特别强调的职能。

与前一职能相比，后一职能有较多主观性。不过，这种主观性是相对的。比如上述道德评价，就当时来看，可说是一些人的主观判断；但就后世来看，则成了一种确已存在的历史现象，一种不可更改的客观现象。

或者说，中国史学“双肩挑”：

左边肩膀挑着史实；

右边肩膀挑着公正，故多有人物褒贬。

这右边肩膀挑着的东西，有些类似其他民族多由宗教挑着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民族的历史所具有的功能与其他民族的宗教所具有的功能，在内涵上是相互交叉的：

有不重合的部分，即一是记史一是敬神；

有相重合的部分，即都在维系人伦价值。

五

一般说来，一个有着道德感的人，自是一个有着内心敬畏感的人。反之，一个内心无所畏惧的人，一个真正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一个无信仰者，自是一个缺乏道德感的人。

至于人们内心具体敬畏什么则因人而异，既有人敬畏宗教性东西，如许多西方人敬畏上帝，也有人敬畏非宗教性东西，如许多中国人敬畏历史。前者的敬畏感由宗教意识维系，后者的敬畏感由历史意识维系。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前者的宗教意识与后者的历史意识，虽对象不同，但功能相近。

有一些中国学者（多为中青年学者）在比较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时，既发出叹息：中国人缺乏宗教感；又发出呼吁：中国人应亲近宗教，应陶冶出宗教感来。

笔者以为，这种说法有些偏颇：

只看到中国人缺乏诚挚的宗教感，未看到中国人富有醇厚的历史感，即能在某些方面替代宗教感的历史感；只看到中国人与西方人有着巨大差异，未看到中国人与西方人也有着一些共性，即都有着内心敬畏感。

一个最重要的也是最简单的事实，就是中国文化以伦理为本位并已延续数千年了，不可能不在中国人的心底酿出相当醇厚的敬畏感，只是这种相当醇厚的敬畏感在今天变得有些淡薄了。

六

根据上述看法，我们还可以引申出其他许多看法，至少还可以引申出下面一些看法。

其一，传统中国史学兼容并包事实判断系统和价值判断系统——传统中国最为丰富的事实判断系统和传统中国最为基本的价值判断系统，因而拥有我们民族最为深厚的精神资源。

正因如此，我们民族拥有一句其他民族不大可能拥有的名言：“史不亡国亦不亡”，即史为国本，史为民族精神之根本。

毁损历史亦是毁损国家和民族的根本，毁史者即祸国者，即国贼。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本书指控那些毁损中国抗日战争史的人做出只有汪伪政权的人才会做出的事（参见本书第41节）。同理，那些肆意毁损和封杀“大跃进”史的人，那些肆意毁损和封杀“文革”史的人……也都属于这一类的人。

就学术方面来说，传统中国史学拥有传统中国最有水准的学术成果和颇见功底的学术大师，或者说，传统中国最好的学术成果和最好的学术大师多与史学研究有关。

传统中国史学由于既拥有学术龙头地位又具有兼容并包性质，从而导致这样一种现象：传统中国的学术极致处与价值极致处是重叠在一起的，与此相应，国学大师的文章与道德是并称于当世的。

比如“章疯子”太炎先生，不仅做出顶级学问，而且坚守终极价值，即坚守我们民族价值系统中的那些最原则的东西，即那些属于“绝对命令”的东西，故而既是睿智之士，又是耿介之士乃至激愤之士。

反观近几十年来中国（大陆）人文学科之所以不出大师这一现象，就学者方面来说，既有学养不足的原因，也有人格猥琐的原因，即在为学做人上，似也太实际、太圆滑了，似也太会顺应各种政治形势、太会迎合各种权势人物了。

其二，当代中国社会风尚发生畸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当代中国人有意无意地忘却历史。一些权势人物有意识地掩饰历史，不准谈“大跃进”，不准谈“文革”，不准谈“六四”，不准谈……以致某长官被人们戏称为“某八十”，即此人说了八十个不准谈。过去许多当皇帝的人都不干涉史官事务，如今一些搞宣传的人却敢歪曲历史、封杀历史。他们嘴巴上

整天说着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实际上总是在那里毁损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最精华的部分——尊重历史。他们的胆子也太大了。

许多普通民众无意识地遗忘历史，患了严重的“历史健忘症”和“被虐待狂症”，对于那些曾无情作践过他们的人和事，或抱着漠然的态度，或抱着感恩的心情。

在我们这样一个宗教意识相对淡薄的民族中，历史感的匮乏直接导致道德感的丧失：许多人只考虑当下的利益，不考虑当下的行为对过去和将来有什么关系、尤其是对过去和将来有什么义务关系；只知现在，不知过去和将来、不知历史和责任。

这种道德感的丧失最突出地表现为信用感的丧失：许多人为了抓住眼前的利益，既能够不履行自己在过去所作的承诺，也能够不实践自己对将来所作的承诺。

信用是在坚守承诺中实现的，坚守承诺是在时间过程中进行的，因此，信用是以历史为载体的，是有历史品格的。这就不难理解，传统中国商人之所以很讲信用，就在于他们深受传统中国文化影响故而多有历史感；同样不难理解，当代中国商界之所以缺乏信用，就在于此间几无文化几无历史。

信贷业不乏有“借钱不还钱”现象，或在应该还钱时不还钱，或在当初借钱时就没打算还钱。一些有着权势背景的企业和个人正是靠着“借钱不还”而完成了自身的“原始积累”。商场上也不乏有“一锤子买卖”和“假冒伪劣品”。前者只要“现在”而不管“过去”和“将来”，后者则连“现在”都具有虚拟性。

与经济领域有许多“借钱不还钱”现象相似，政治领域也有许多“讲话不算话”现象。在共和国宪法中，我们看到了“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信仰自由”；在执政者实践中，我们则看到了“阳谋”，看到了对所谓“反革命言论罪”和所谓“反革命组织罪”的严惩，看到了对所谓“颠覆 XX 罪”和所谓“加入 XX 罪”的严惩。我们民族的发展正面临信用资源严重短缺的形势，并正受到信用资源严重短缺的制约。

在与发达国家即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打交道时，我们常常遭遇对方充满狐疑的目光，以致一度在美国民意测验中被美国公众指认为最有敌意的国家。可是，这个美国恰恰是中

国对外贸易的最大市场和中国海外人才的最大聚集地。

在发展现代新经济时，我们也遭遇信用不足问题。

现代新经济有两大杠杆，一是风险投资，一是知识创新，都是以高度信用为前提的。很难想象：在一个借钱不还现象屡有发生的国度里，还会有许多人敢作风险投资、敢作这种风险再加风险的投资；在一个盗版现象泛滥的国度里，还会有许多人愿作知识创新、愿作这种三年努力一日被盗的创新。中国已成为一个信用资源严重短缺的国家。

其三，笔者对黄仁宇先生关于中国史书“最大的通病，是以道德的立场讲解历史”（《地北天南叙古今·怎样读历史》）这一观点持保留态度：

一是在描述层面上，与黄先生无多分歧，认为中国史书确有一些内容“以道德的立场讲解历史”；

二是在评价层面上，与黄先生有些分歧，认为中国史书拥有这些内容未必是弊病，更谈不上是“最大的通病”；

三是在解释层面上，就黄先生在大陆出版的几本著作来看，认为黄先生未能充分说明中国史书为什么会有这些内容，或中国史官为什么都要这样著述历史。

黄先生认为，作历史研究应“亟欲知道”历史现象“何以如是”（《中国大历史·中文版自序》）。可是，黄先生在向我们指出中国史书的“最大的通病”时，未能让我们知道这一现象“何以如是”。

七

历史本身是有不同层面的，既有技术层面，也有价值层面以及其他层面。

与此相应，历史著述也是可以从不同角度切入的，既可以从技术角度切入，如黄先生所强调的那种“大历史观”；也可以从价值角度以及其他角度切入，如《资治通鉴》中的“臣（司马）光曰”所作出的那些评述。

在此，我们不否定黄先生的大历史观，但否定黄先生对传统史观的否定。

我们可以把历史设想为一个有着X轴、Y轴、Z轴的三维空间。

我们可以将由X轴与Y轴所形成的面，设定为技术的面，即黄先生所强调的那种技术的面；并可以看到，上面有一条不断延伸的曲线，左端为“不可用数目字管理”，右端为“可以用数目字管理”，总体趋势趋于向上。

我们还可以将由Y轴与Z轴所形成的面，设定为价值的面，即中国史书所坚守的那种价值的面（或道德评价的面）；并可以看到，上面有一条不断震颤的线段，一会儿左端（有德）低落（无福）而右端（无德）高起（有福），一会儿左端（有德）高起（有福）而右端（无德）低落（无福），总体趋势趋于持平。此外，我们还可以作其他连接，还可以看到其他层面。

黄先生主张史书不应“以道德的立场讲解历史”，对于一般史学来说，属于适宜要求，因为学科分工要求历史学研究方式与伦理学研究方式应有所区别；但对于中国史学来说，似乎有些不近情理，因为这好比是强求一个养母扔下她已照看多年的养子。

两千年来，中国史学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中国道德尤其是中国政治道德的监护人，或者说，中国道德尤其是中国政治道德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中国史学的被监护人。一旦脱离这个监护人，这个被监护人就可能由养子变成居无定所且行无定规的浪子，如现代中国那些无法无天的政治权势人物们。

传统中国史书比较注重采写政治方面史料，既对之作如实记述，又对之作善恶褒贬，从而对那些政治权势人物至少形成两方面压力：

一是成就压力，怕被史书写成一个碌碌无为的人；

二是道德压力，怕被史书写成一个品行卑劣的人，既使自己留下恶名，又使子孙蒙受耻辱。事实上，在我们这样一个宗教感较淡薄的民族里，能够让那些权势人物特别是那些权倾天下的至尊君主感到害怕的东西，也只有史书了。这一点可以从李世民与褚遂良关于史官应对天子“备记善恶”那段著名对话中看出。

在中国历史上，除少数起于乱世的草莽英雄外，大多数中国政治权势人物都曾熟读过史书，至少都曾在弱冠之前熟读过史书，都曾把读史作为自己的一门必修功课，因而都或多或少地感到史书的分量。对于他们来说，史书既是从事政务的教科书，故受其教化；又是人物操行的鉴定书，故受其震慑。

比较而言，中国史书对权势人物的制约力要大于对普通百姓的制约力，君主比人民更怕史，贵族比庶民更怕史。这不仅因为前者比后者受过更多的史书教育，而且因为前者中的许多人本身是要上史书的，是要受到历史严厉考核的，其生前拥有权势的大小与其死后受到严厉考核的程度成正比。

八

现代中国一些权势人物，总想着要高升，要进中央委员会，要进政治局……不知是否想过，自己在成为国中权贵的同时，也上了历史考评的名单，即要接受后人非常严厉乃至苛刻的剖析和评断，并将因此而使自己的明亮面与龌龊面都展现在包括自己的子孙在内的世人面前，有可能像个君子，有可能像个小丑。

当然，人和人不一样。有人不在乎这一点，只要活得好，哪管身后事，故而使用起权力来，随心所欲，无所顾忌。

也有人很在乎这一点，很在乎自己身后是否被“掘墓鞭尸”，故而使用起权力来，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可以说，中国史上凡是有品味有教养的政治家，都很在乎自己身后事，如胡耀邦言：“我不能让人几十年后指着脊梁骨骂！”（近闻朱镕基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坦言：自己若能被后人称为“清官”就很满意了）。

传统中国史书正是以道德褒贬的笔法，用黄先生话说即“以道德的立场解说历史”的笔法，能够在相当长时间里，将中国政治道德尤其是中国高层政治道德，维持在一个大致说得过去的水准之上，至少维持在毛泽东这一朝的水准之上。

传统中国史书正是以道德褒贬的笔法，能够在相当长时间里，使中国权势人物尤其是能上史书的中国权势人物，在掌握较多的社会资源的同时受到较大的道德压力，至少在死后受到清算。

传统中国史书正是以道德褒贬的笔法，能够在相当长时间里，起到维护社会公正的作用。当然，这种作用常常是通过一个时间差——褒贬对象的生前与身后的时间差——来实现的。

笔者注意到，黄先生在他的几本著作中都谈了他的一个重要观点：“历史在长时间内所表现的合理性”或“历史上的长期合理性”（long term rationality of history）。

中国史书“以道德的立场讲解历史”已讲解了两千年，无疑成了一种长期历史现象。按黄先生上述观点，似乎也应有了一种“历史上的长期合理性”。

何况我们民族向来是很讲求实用的，既然能长时间做一件事，就一定认识到做这件事是有许多好处的。一个很实用的民族，不大可能长时间地并很努力地做着一件很无用的事情。黄先生是学术前辈，学养丰厚。我读过他的书，受益颇多，本想就上述问题请教他，后知他已仙逝，不禁怅然。

本书书名中的“春秋”一词正是取其传统意义：一是记述历史，二是褒贬人物。这正是本书所信守的一个理念。■

此文为单少杰著《毛泽东执政春秋》（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年12月）一书的附录，原书第595--604页。谨向作者鸣谢！

【收藏】

编者按：

本刊上期刊载了谢定国先生的北大日记被胡佛档案馆收藏的消息。¹四月又收到了王复兴先生的来信及同类文字。本刊决定设立这个专栏。中国革命，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共同的精神遗产。爱国不分内外，举凡有条件收藏保存，无条件地向全世界的读者开放的机构，我们都可以像谢定国、王复兴一样，将资料捐赠给它们，以供后学研究借鉴。

收藏、保存、开放上述资料，供全球读者阅览的机构，除美国的史丹福、普林斯顿等大学外，还有欧洲的法国洛林大学、瑞典的隆德大学，澳洲的墨尔本大学等。

王道士把敦煌的文物交给了法国人，遭国人斥责。试想，如果这些文物留在中国，在军阀混战，国家失序，盗贼如毛的百余年中，它们还能保存完好，流传至今吗？

闲读网文，得信息两则——

2015年8月，在一个座谈会上，杨奎松谈到，2003年，他根据上海五十年代的档案，在华东师大校刊上发表了一篇谈上海政法的论文。中央办公厅给中国档案馆打电话，责成追查。从此，杨奎松成了“档案杀手”——“就是我去一看档案，回过头来再去查那些档案，档案馆说我们没开放过，从来没有提供过。”人家还要质问杨奎松“你怎么看到的？”（《革命与摩登：杨奎松、张济顺、沈志华谈1950年代的上海》）

2016年5月，原汕头市副市长彭启安积二十年心血，用社会捐款二千余万元在汕头澄海塔园建立起来的，占地三百余亩的首座文革博物馆“被全面销毁”：“以黑白水泥、砂浆涂抹所有碑文，以铁皮包围房屋及大型碑墙、雕像等……塔园软件资料包括大批字画、书籍等，被运出塔园，去向不明。”徐小青：《塔园文革博物馆二十年兴亡史略》，载《昨天》89期）。何以胡佛档案馆资料丰赡，由此可知。■

¹ 胡佛研究所成立于1919年，位于美国加州史丹福大学。由美国第31任总统胡佛创立。全称是“战争、革命、和平研究所”。现在已成为全球著名的近现史资料库及美国智库。馆藏有160万册藏书、4000万件档案。该所有“中国现代史档案馆”。每年全球有许多学者（包括中国大陆的学者）来此查资料和搞研究。近来被查看的最多资料是《蒋介石日记》

胡佛档案馆设立“王复兴专档”

王复兴先生来函

致《记忆》编辑部：

拙作《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回忆录》承蒙贵刊编辑部在《记忆》上首发并连续选载。拙作于2016年9月由《美国南方出版社》正式出版并在亚马逊销售后，我曾于2016年12月初邮寄、赠送该书至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东亚图书档案馆。胡佛东亚档案馆馆长林孝庭先生来函，建议在胡佛档案馆设立“王复兴专档”，建议我捐献该书的草稿、学习笔记、参考资料、旧照片等。后来又同意在专档中设立本人祖父、父亲的史料卷宗。目的是供学者及后代研究中国文革史之用。

我已于2017年4月中，邮寄给胡佛研究院约24磅重、0.4立方米、上千页的纸质资料。并于4月18日与胡佛档案馆签署了捐赠合同。

以下为胡佛东亚档案馆馆长给本人的三封邮件：

王先生您好：

您所赠送的两本大作已经收到，非常感谢您！胡佛档案馆并不收藏出版专书，我会遵嘱将您的大作送往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收藏，让更多读者都有机会拜读您的大作。

此外，不知您是否有兴趣让我们替您在胡佛档案馆成立个人专档（王复兴专档）？胡佛档案馆举世闻名，然我们只收藏史料，不收藏图书，若您愿意把您的个人手稿、照片、回忆记录、信函等捐给胡佛，我们将可以为您成立个人专档，以您过去在文革所经历的诸多事件以及对这段历史的丰富研究成果，若能够在胡佛成立专档，将有助于让来自全球的研究者，透过您的个人资料收藏，进一步理解文革与您个人的不平凡经历。此事请您考虑一

下，若您有此意愿，请随时与我联系，我将尽全力来促成"王复兴专档"在胡佛档案馆的成立。

胡佛档案馆东亚馆长

林孝庭 敬上 2016.12.06

复兴先生：

非常感谢您的无私决定与远见！数十年后，我们终将离开这个人世，然而您所留下来的珍贵资料，将会继续妥善保存下来，让后人有机会透过您的资料，永远不忘记文革这段历史。

有关您所提问题，请允许我回覆如下：

（以下答复问题省略）

请复兴先生您准备一份简单的自传，中英文皆可，届时胡佛成立专档时将会需要这方面资料，来简单叙述您的背景经历等。而一旦专档对外正式公开，全世界都能够透过斯坦福大学图书馆网路查询系统，查到您馆藏相关资料。

再次感谢您，并期待与您进一步的交流联系！

孝庭 敬上 2016.12.07

复兴先生：

胡佛档案馆长 Dr. Eric Wakin 已经在英文合同上签字，并表示胡佛对您感谢之意。我今天将把其中一份回寄给您，……。

孝庭 敬上 2017.04.26

以上为斯坦福大学福胡佛研究所东亚档案馆馆长林孝庭先生的三封来函。此外，林先生告知，本人的专档将按英文字母检索，因此会以本人英文名字标注专档，即 Fook Hing Wong，同时注明中文姓名王复兴。《记忆》的读者、学者中对相关史料有兴趣者，可向斯坦福大学胡佛东亚档案馆查询、阅读。

我给胡佛档案馆东亚馆提供的资料，除了书稿的草稿、友人意见、摘录的资料等等以外，还有本人在《记忆》电子杂志发表的几篇关于北大文革的文章（与书稿内容有关）。

专档中，祖父王卓然的卷宗，有他的自传、文章、信件、旧照片等。王卓然曾是张学良将军的重要文官助手之一，后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文革中曾被所谓“东北帮”问题关押到秦城监狱。

父亲王福时的卷宗，有他的口述回忆录、旧照片等。王福时是斯诺《西行漫记前传》即《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的主编和发行人。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后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图书馆馆长。

新北大公社胜利团的卷宗，有许多剧照、乐谱、节目单等。“胜利团”是文革时期“新北大公社”著名的大型文艺团体。该卷宗对瞭解当年大学生的思想状态和文革时期的群众革命文艺状况，应有一定价值。

文革無疑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件极其重大的历史事件。它的失败结局，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并影响了世界的格局。后代的人们定会不断地挖掘、探索、研究这个奇特的历史大事件的真相。我希望我的文革档案，能为文革史料增添一些有用的“碎片”。■

王复兴 2017、05、02

【读者来信】**1. 陆伟国正误**

第 182 期刊载的我的那篇文章的标题，目录与正文不一致。正文是对的，目录是下一期的。■

2. 任富田与王复兴的通信

王复兴先生：

我很赞赏您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产生原因初探》一文（《记忆》182 期）因为以前关于第一张大字报出笼的“预谋、指使”之说盛行。大文力驳成见，另创新说，对澄清史实有所推进。但是，此文有一处疑问：“（文革后刘仁证实，联合调查组是两校党委决定（派出）的）”，这个地方应该说明一下“刘仁”是何许人。我开始认为是前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但经查那个刘仁于 1973 年 10 月含冤去世。为了使这篇文章经得起推敲、请王先生解释一下这个“刘仁”的身份。

《记忆》编校：任富田 5-2

任富田先生：

拙文第 14 页，“文革后刘仁证实，联合调查组是两校党委决定（派出）的。”一句应改为：“1962 年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在北大办公楼召开的会议上，为北大、人大两校联合调查组甄别平反时，证实联合调查组是两校党委决定（派出）的。”谢谢任先生的质疑。

■

2017 年 5 月 6 日

【本刊声明】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 凡认同本刊的宗旨，并取得会员资格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信箱：fxc1966@163.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编校：任富田 陆奇 予庆

封面设计：水 点

版式设计：韦 陀